

新视界

NEW VISION

学人访谈

在国际经济新环境下对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思考 P01

学术论文

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 P12

国关人物

江忆恩 P32

他山之石

社会科学的价值是什么? P39

毕业特辑

..... P55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编者的话

对于校园里的老师和同学来说，6月是个特别的月份。在6月，有毕业季的兴奋，也有离别的伤感，有顺利完成学业的骄傲，也有对未知世界的迷惘。在这个混合着多种情感的月份，今年的《新视界》夏季号也出炉了。

6月结束后，将有一大批同学走出南开园，奔向新的世界。本期《新视界》的“毕业特辑”就记录了许多毕业生这四年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向还在校园的同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希望这一期的毕业特辑，能够带来一些思考与借鉴，也祝愿毕业的同学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这一期的其他内容也非常精彩：赵龙跃教授在访谈中介绍了他所在南开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同时也畅谈他对世贸组织（WTO）、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时事观察”为大家带来了越南反华事件的分析；这次的“国关人物”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江忆恩，该栏目系统地介绍了他对中国“昨天、今天、明天”的观点；“他山之石”则翻译了一篇探讨社会科学价值所在的文章，观点鲜明，行文犀利，读完给人醍醐灌顶之感；“海外南开人”则刊登了两位学长在新加坡学习的经历；“英采飞扬”探讨了气候问题；“新书架”介绍了关于领土问题的书籍……各个栏目都有精彩的内容等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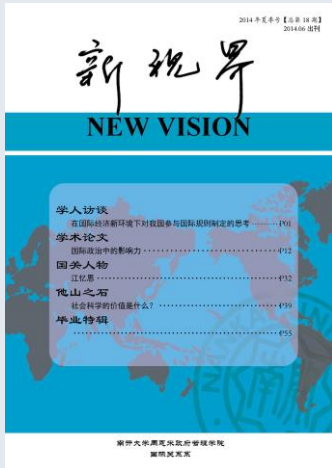
在编辑部呆了快四年了，今天也是最后一次有机会在《新视界》上写点东西。记得去年夏季号瓜姐在“编者的话”里写道：“临别一帖，不舍才下眉头，怀恋犹在心间。”今日读到这句话，甚是感慨。想到刚进入编辑部时，冲哥、瓜姐、金潼学长等若干元老对我们这些“新手”耐心地教导，如今自己都已经要离开了。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系刊终有后来人。不断涌入的新鲜血液让系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希望编辑部的同学们继续把系刊发扬光大！

同时，也要感谢院系老师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没有老师们对我们的悉心呵护，《新视界》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还要感谢各位忠实的读者，你们的关注与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总之，谢谢所有人对我们的关爱！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吕某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海涵！

吕海敬上

2014年6月7日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主办



2014年夏季号
【总第18期】
2014.06 出刊

主编：吕海

本期执行主编：王宝盆

副主编：

郝丽君 郭晓琼 刘芮宁

沈琳 王宝盆

编辑部成员：

陈一一 程康 董柞壮

高振华 胡阳阳 姜忆楠

江昊宇 缴懿鑫 李漩

李安琪 李冰莹 李基凯

李家胜 李萌 李天翼

李志宇 刘志 马垚粮

宁鹏举 裴瑶 彭紫嫣

任娟 石宇 孙迪

唐铭兴 王迪雅 王芳琳

王燕 杨雪 杨至远

姚丽丽 于凯玥 张晓康

赵姝婧

封面设计：郭晓琼 刘芮宁

目录

编者的话 (I)

学人访谈

在国际经济新环境下对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思考：
兼谈南开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赵龙跃 (1)

时事观察

从“981”钻井平台事件看中越关系.....刘若楠 (10)

学术论文

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刘志 (12)

国关人物

江忆恩..... (32)

他山之石

社会科学的价值是什么？.....亚瑟·卢比亚 (39)

聚焦

第四届“全国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征稿通知
..... (47)

暑期班专栏

新加坡暑期班见闻.....董柞壮 (49)

新国杂感.....何睿 (50)

英采飞扬

对于提高天津空气质量的建议.....李嘉东 (53)

目录

毕业特辑

- 经验分享..... (55)
- 大师寄语..... (60)
- 毕业感言..... (63)
- 恩师寄语..... (64)
- 国际关系系 2014 届部分毕业生去向..... (64)

新书架 (二) (66)

院系活动

- 学术交流..... (68)
- 师生活动..... (69)
- 校外短讯..... (71)

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73)
-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75)
-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78)

读编往来..... (85)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88)

征稿启事..... (94)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 2010 年 6 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编辑组、新闻组和网宣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
(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在国际经济新环境下对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思考： 兼谈南开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专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赵龙跃教授

【编者按】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越来越多，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治理方面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我们参与国际治理需要什么样的人？在当前国际经济规则推陈出新的情况下，WTO 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美之间应该如何互动以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赵龙跃教授进行了专访。

嘉宾：赵龙跃教授

时间：2014 年 5 月 23 日

地点：范孙楼

人物介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贸关系、经济全球化管理、WTO 与国际经济谈判、中美经贸关系。

曾长期在我国政府部门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和国际合作工作，多次参与国家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研、对外经贸合作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等工作，对我国的经济贸易政策、政府组织管理、世界贸易组织和中美经贸关系等都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著名的国际经济法学专家、被誉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约翰·杰克逊(John H. Jackson)教授，集中从事 WTO 组织机构和法律规则、美国公共政策管理和对外经贸政策和法律的学习研究工作，获得乔治敦大学《世界贸易组织专家证书》。曾任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主讲 WTO 协定与中美经贸关系等课程；世界银行国际贸易问题咨询专家，从事国际贸易与发展、经济全球化管理等问题的研究工作。

现在南开大学创建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CID) 并兼任主任。

(一) 国际事务与国际经济规则

《新视界》：我们目前对于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感受最深的，首先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比起以前多了很多，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相对于美、欧、俄、日等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占有一定优势的国家，我国在参与国际治理方面，比如对 WTO 规则的制定和利用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您怎么看待这些不足？

赵龙跃教授 (以下简称“赵”)：今天

我们的采访也来一点创新，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我想请你们先考虑一下，与美、欧、日、俄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存在什么样的美中不足，如何改进完善。

《新视界》：我们的感觉是，我国在参与国际经贸谈判、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仍然缺乏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对许多国际问题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您怎么看？

赵：我和你们有许多的同感。根据我个

人的工作经历，无论是在国家部委从事国际经贸合作工作，还是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国际会议，我们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特别是高端复合型专业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别重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综合性、复合型的高端专业人才仍然奇缺。参与国际事务的复合型高端人才首先要过英语关，能够运用英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次要掌握一定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律和谈判的知识。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是我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的突破口。在使用人才方面我们也会存在一些问题，缺乏一个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充分地发挥专业人才作用的机制，这个问题比缺乏人才还要严峻。

另一个不足是对国际问题的独立研究和见解，特别是前瞻性的、系统性的研究还比较少。如果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和把握不够准确，那么我们就很难提出一个可以得到世界认可的解决方法，也无法准确地判断有关方案对我国的影响。对于外国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需要消化吸收，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尽管我们现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但是还远远不够，直接引进的比较多、重复研究的比较多，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如何弥补上述两个方面的不足，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南开大学创建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背景和初衷，针对经济全球化管理和国际发展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组织比较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和交流活动，为我国政

府和企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全球化的管理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为我国全面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培养专业人才。

《新视界》：您对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有什么看法？是否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中国又可以为这些规则的改变做些什么？

赵：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大多是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首先体现的当然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规则。WTO 的法律文本一部分是承袭了原来的关贸总协定，另一部分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形成的一些新的规则。我国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成员参与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过程，只是没有表决权，前提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生效后，中国必须完全接受乌拉圭回合形成的成果。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熟悉国际经济规则的极好机会，使我们在加入 WTO 之前，就开始对国内的有关规章制度进行调整，所以当我们加入 WTO 之后，适应的就比较快，避免了一些可能的震荡。

我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在国际社会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现行的一些国际经济规则不仅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有些规则还是专门针对中国甚至是用于限制中国的。最明显的条款是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使我国出口产品遭遇了极其不公平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补救措施的调查和关税；还有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特殊保障条款，即允许其他国家在认为进口中国产品比较多时，可以单方面采取诸如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保护他们的国内市场。

制定国际规则的时候,如果不能客观全面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就是最大的不公平。那么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完善这些国际规则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工作呢?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完善和制定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目前多哈回合谈判虽然面临重重困难,有些国家甚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上,企图绕开 WTO,抢占新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制高点。我们要加强区域贸易协定、超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把多哈回合的发展议程真正落到实处。

《新视界》:多哈回合谈判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关于农产品的谈判依然没有明显的成果。有人认为这一谈判会遥遥无期,您对此怎么看?

赵:多哈回合谈判从 2001 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十几年,虽然步履维艰,但是我对多哈回合的成功充满了希望,因为多哈回合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供了重要的舞台。2013 年 WTO 第九次部长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中国为会议的圆满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 WTO 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显现出来。只要我们坚持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坚持多哈回合的发展议程,坚持更多地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取得多哈回合的圆满成功还是大有希望的。

《新视界》:郎咸平曾经评论说,中国在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屡次败诉的原因是中国官员不熟悉 WTO 规则所致,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这种观点呢?

赵:不能把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此地简单

化。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是 WTO 这顶皇冠上的明珠,在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1995 年 WTO 成立以来到 2014 年 5 月,在争端解决机制正式立案的有 479 起,涉及中国的案例有 153 起,其中我国作为起诉方的案例有 12 起,作为被诉方的案例有 31 起,作为第三方参与案例有 110 起。决定贸易争端案例胜负的因素很多,既有规则方面的原因,也有应诉能力方面的原因。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缺乏自己的律师队伍,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但是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聘用一些来自于美国、欧盟等外国的律师专家,这就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必须具备更高的水平,去管理和发挥这些专家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对这些专家的工作听之任之。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在应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方面,情况越来越好了,我们国内的律师事务所也越来越多了,水平越来越高了。将来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地加大对 WTO 规则的研究,培养和使用更多国内的法律人才,应对各种国际贸易争端。

《新视界》:前一段时间,WTO 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稀土争端中裁定中国败诉,这一事件带给中国的启示是什么?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减少在类似贸易争端中败诉的情况?中国又如何能在不违反 WTO 规则的前提下,实现对本国资源的保护呢?

赵:今年 3 月 26 日,世界贸易组织公布了美国、欧盟、日本诉中国稀土、钨、钼相关产品出口管理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专家组报告一方面是认可中方对稀土、钨、钼采取的综合性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另一方面

认为中方对稀土等涉案产品的出口关税、出口配额以及出口配额管理和分配措施不符合有关世贸规则和中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可见专家组报告并没有全面否定中国的政策措施。而且我们要注意,对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无论是专家组报告,还是上诉机构的裁决,都不应该用胜诉或败诉去看待,只是有利或不利的裁决;而且胜诉也不一定有利,败诉也不一定不利。我国对于稀土资源尚未找到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曾几何时我们采取过出口退税政策鼓励稀土出口,甚至把稀土当粪土卖。美国日本不仅不开采利用自己的稀土资源,而且还大量进口稀土储存备用。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护稀土资源,适度开发利用,而是那么粗放地毁坏我们的资源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管理问题,保护资源、有效利用、适度调节,不一定非得采取贸易措施。

《新视界》:在当前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如各种双边、多边的经贸协定等丛生的形势下,您认为 WTO 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

赵:目前确实有些人认为世贸组织的地位、作用没有从前那么重要了,美国对于世贸组织的兴趣也没有原来那么大了。我不太认同这些观点,美国对世贸组织的兴趣没有降低,只是在世贸组织中唯我独大的局面有所变化,因为世贸组织以前是由美欧主导,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的席位越来越多,像中国、巴西、印度等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美国开始寻求绕开世贸组织,继续垄断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新途径,抢占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制高点。目前美国主导的 TPP、TIPP 和 TISA 谈判,不

同于普通的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而是所谓的超区域协定,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寻求贸易的便利和优惠,而且更加关注规则的制定和政策的协调,给世界贸易组织带来许多新的挑战。世贸组织目前的处境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研究利用好这个机会。

《新视界》: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美欧逐渐抛弃 WTO,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 WTO 中占据有利地位还有意义吗?

赵: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首先, WTO 不是美欧的 WTO,他们只是 WTO 的重要成员,并不存在美欧不要 WTO,世贸组织就不复存在的问题。其次,不论是对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成员,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世贸组织的地位不仅不能下降,而且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世贸组织在贸易政策审议、贸易争端解决方面仍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在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方面,确实面临一些困难,但这种困难并不说明世贸组织不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它很重要。

(二)中美经贸关系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新视界》: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新时期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赵:对于美国是不是重返亚太,我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美国始终非常重视在亚太地区的存在,2007 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乔治敦大学维克托·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决胜亚洲:华盛顿没有讲出来的成功

故事》。维克多曾于 2004 年-2007 年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亚洲局局长、美国朝鲜六方会谈代表团副团长。文章认为布什政府的亚洲政策,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应该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目标更加显露,政策措施更具有进攻性。

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多个发展过程,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合作领域更加广泛,摩擦问题更加复杂。过去我们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时对美国的抱怨比较多,今后要逐渐改变这种状况,主动采取措施,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特别是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天平开始倾向于中国,现在这种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今后我们在研究解决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时,必须要关注这些变化,从而研究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原来被动应对的做法,致力于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客观全面地总结中美经贸合作对两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用事实向美国和世界展示中美经贸合作给美国、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带来的好处。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对美国政治制度、对外经济政策、以及社会国情的研究,准确地把握美国国会、政府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面对问题,对症下药,避免误导。第三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既不能过分夸大美国的力量,也不能低估美国的实力,坚持平等对话、互惠互利的原则,在中美经贸合作方面争取更大主动。第四,利用多边渠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改革完善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消除

不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内容,减少或避免中美之间的正面冲突。第五,进一步加快培养和充分发挥我国有关专业人才的作用,研究制定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系统的和一致的对美行动方案和指导原则,并贯穿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日常国际事务中。长期以来,我国对中美经贸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缺乏一个统领全局的行动方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快培养并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研究制定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长远战略与策略,更加科学地处理有关贸易摩擦问题,不断提高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鉴于以上情况,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的课程设置中,专门有一个《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单元,重点分析介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管理体制和执行机构,美国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法律依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贸易统计数据库的使用,以及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新视界》:目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有哪些重点和热点问题呢?如何化解或解决这些热点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赵: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着有本质和现象两类的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本质问题我就不展开讲了,在存在的现象问题中,美方主要关注的有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中方关注的主要是美国的出口管制问题、对华在美投资的安全审议问题等。

所谓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就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一个重

要问题。存在贸易逆差才能成为真正的贸易大国，只有美国才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发展中国家都是贸易顺差国家，否则就会面临外汇短缺、资不抵债、经济崩溃。况且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很特殊，既有双方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因素，也有全球供应链的时代因素，双边贸易平衡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过去我们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够，所以在应对美国的抱怨时没能给出最有力的反驳，甚至还可能引起其他具有相关产业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实际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不完全是中国制造的产品，许多是在中国组装的产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出口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出口。

人民币汇率问题更加复杂，美国方面的专家也坦言，谁也不知道人民币兑美元的公平合理的汇率究竟是多少。在过去好长一段时间里，人民币汇率低估给美国低通胀高增长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自 2005 年中国央行汇率重启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幅逾 27%。人民币升值对于美国经济既有利也有弊，升值有利于提高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促进出口，带动经济复苏，有弊是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真正意图不只是在短期内的升值，最终目标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机制。

如果我们能够全面把握这些问题的实质，那么我们就能找到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有效措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处理中美经贸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双边会谈，还是在多边场合，都要研究一个统一的对外口径，一致对外，避免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不同的声音，影

响我国的大国形象。

（三）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新视界》：前面您介绍了在南开大学创建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初衷，非常重要，现在四年已经过去了，中心工作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就？

赵：前面我已经介绍了一些，我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我国全面有效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的需要，组织一些系统的比较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组织一些专题研修项目，为我国全面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全球化管理培养专业人才。四年来中心的工作得到了校内外、国内外专家、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合作，所以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课题研究方面，我们中心前后承接了天津市委研究室、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外国专家局、财政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OECD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 10 多项研究课题；通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商务部和新华社等渠道，为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提供决策参考报告 20 多篇，其中有 3 篇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公开发表的论文 20 多篇，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从制定国际规则的角度分析 RCEP 面临的挑战》、《美国战略东移的经济方略：内涵与应对策略》、《如何看待美国的衰退，中长期中美经贸关系展望》、《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关注美国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新动向》和《多哈回合的前景与我国的应

对措施》等多篇。

在开设课程方面,中心围绕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培养专业人员的需要,借鉴美国大学有关专业的培养方案,研究开设了 5 门全新的课程:《国际管理与中国》、《国际经济谈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贸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政策分析模型与方法(WITS)》。

在国际合作方面,第一,世界银行已经正式将我中心作为《国际贸易政策分析模型(WITS)》在亚太地区的培训基地,重点工作是为我国及其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术机构提供 WITS 的培训。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最近一期培训班将在今年 7 月份举办。

第二,中心与马里兰大学合作,建立了《南开大学马里兰大学国际谈判模拟中心》,将作为我国开展国际谈判教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与马里兰大学合作联合举办《国际谈判与国际经贸谈判》专题研修班,研究开发更多的模拟国际谈判案例,以及培养国际谈判/国际经贸谈判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三,中心与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合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高级官员提供各种专业培训:2013 年为朝鲜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举办了“贸易促进与外资利用”研修班,朝鲜选派了 12 位高级官员参加;2014 年将为朝鲜高级人民法院举办“贸易投资争端与经贸仲裁”培训班,朝方将选派 15 位高级法官参加。

在高端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中心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合作,联合启动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

目”,已经举办了三期专题培训班。今年即将启动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级复合专业人才需求研究和培训项目”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新视界》: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与一般的培训项目有什么不同?

赵:“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主要是根据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培养熟悉国际政治、外交、经济和法律的综合性、复合型高端人才;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管理,培养输送高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的重点是熟悉国际管理知识、把握国际发展趋势、强化战略布局能力、树立全球领导意识四个方面:

一是要熟悉国际管理知识,了解国际管理的理论与学派、国际管理体制的探索与历史演变、国际管理中的大国关系、国家、地区组织与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管理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等。

二是要把握国际发展的趋势,不仅要了解其过去,而且要展望未来。如果我们仅仅了解过去,而不能把握未来,那么我们只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引领国际事务,那我们必须要有自己超前的研究和展望。仅仅学习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够了,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三是要强化战略布局能力。只有在全面了解过去、准确展望未来的基础上,才能具备较高的战略布局能力,否则面临突发情况,

就只能是在穷于应付和应对了。应对往往被动，我们需要学会引领，凡事预则立，研究发展趋势，提前谋划布局，才能应对游刃有余。

四是树立全球领导意识。对内讲是全球领导意识，对外讲是树立全球责任意识，因为领导就意味着责任。我们现在一定要有全球领导意识，在分析和处理任何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反映，只有充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树立全球领导意识和全球责任意识，这是一个国际战略问题。维护自己的利益，也需要考虑一个国际的说法，不然很难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毛主席总是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就在全世界树立起一面旗帜，得到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因为中国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利益。今天也一样，在研究解决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时，想办法把它提高到关系国际安全的高度，那么就更容易得到更多国家的关注与支持。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什么补什么”。高级研修班课程采取专题模块形式，分为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相对独立、滚动开发、全年开放，学员可以根据自己工作的需要和安排参与相关单元的研修。课程设置涵盖了全球经济治理所涉及的政治、外交、经贸和法律等多个学科领域，以及当今国际管理机制发展演变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已经熟悉国际经济知识的学员，他们就可以选择培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方面的课程；对于具有国际关系知识背景的学员，就可以选择培训国际经济方面的课程。这样他们接受培训的知识就不会重复，也可

以根据不同的时间来选择，因为我们培训的对象比较广泛，不仅有政府官员，还包括高年级优秀本科生、研究生，这就保证我们培训的效率，也突出了我们这个培训不同于别的培训。

我们举办研修班的另一个目的是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一方面我们将从参加研修班的学员中选拔部分优秀学员选送到国外进一步深造，可以是短期的研修学习，也可以是进一步攻读更高的学位。另一方面是发现选拔部分人才推荐到国际组织，参与国际组织的竞聘、工作和任职，这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学习锻炼。

最后，我们发现和选拔部分人才参与中心的研究工作，形成一支全新的研究队伍和研究网络。我们现在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重复研究比较多、合作交流比较少；直接引进的比较多、独立分析比较少，今后需要在前瞻性、综合性和独立研究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我们非常欢迎有关方面的青年学者参与中心的研修和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献计献策。

（四）老师寄语

《新视界》：又到毕业季，有一批南开国关学子将要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或者继续深造，还有一批未来的国关人将走进南开园，您对他们有什么寄语呢？

赵：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此给同学们说几句话，首先是祝贺你们又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毕业走出校门，还是入学进入校门，都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取得优异成绩。其次是祝

贺你们恰逢其时,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需要大量深谙国际事务的复合人才,为你们提供了大量的用武之地。当然,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同学,希望你们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多读书、多实践,把自己塑造成综合性、复合型的高端人才。英语是基础,一定要学好,不仅要掌握地道的会话英语,更重要的是能够运用英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除了学好国际政治、外交理论之外,还要学好国际经济学,中国外交部 2012 年专门组建国际经济司,足见国际经济在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另外,还要学好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法,参与国际事务需要在国际规则的框架下去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毕业班的同学们,也许目前你们所找到的工作与你们所学习的专业表面上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是你们所学到的知识

仍然是很重要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自己,全面掌握上述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必将大有作为。

《新视界》: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最后请您为我们的刊物提一些建议。

赵:《新视界》办的非常好,我很喜欢,每期必读。《新视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新颖,每期都有一些比较超前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些成就都是编辑部同学们自发努力创新的结果,刊物给读者和编辑的同学们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刊物发行以来,得到了全国各地兄弟院校学生和老师们喜欢,很不简单。编辑部还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有序竞争、平稳过渡的领导机制,这也是同学们学习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希望你们继续发挥这些优良的学习风气、踏实的工作作风,把《新视界》办得更好!

[整理:李家胜、李天翼、刘志、宁鹏举、裴瑶、赵姝婧]

[校对编辑:董柞壮]

[责任编辑:赵姝婧]

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

——主要维度、评估标准及实现路径

刘志*

内容提要: 本文从现实主义学派内部对国家行为主导模式的争论出发,对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进行探究。影响力是指一个行为体使得另一行为体的行为和态度符合自身意愿的能力,它有军事、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四个维度,其衡量标准是一国外交政策作用下其他行为体态度、行为与事件的结果。影响力的运行机制经历了“国家力量——政府力量——影响力”这一路径。政府在这一路径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从国家力量到政府力量的转换能力、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力这两方面。在外交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军事行动、利诱、威胁、吸引或劝服是影响力得以实现的四种最主要的路径。对影响力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关键词: 影响力; 权力; 实力; 外交政策; 政府

一、引言

影响力(influence)是国际政治中重要而常用的概念。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新闻工作者以及政治科学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科学者都常常将影响力挂在嘴边。因为对国家行为的理解不同,现实主义学派内部出现了一些争论。此外,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实力和权力这些概念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影响力的丰富内涵。

(一) 现实主义学派对国家行为主导模式的争论

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围绕国家行为的主导模式是什么这一问题,现实主义流派内部有着不同的看法。^①结构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无政府状态意味着生存是一国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国家追求的是安全最大化(security maximum)。他还认为,体系的逻辑,强迫每个国家采取自我限制,维护现状的行为。^②

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国家追求的是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um)。它们抓住一切机会来增加权力,这并不是人的本性使然,而是一种结构诱导行为。因为“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中的最后手段”,所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更少被其他国家攻击。此外,安全在国际体系中并不容易获得,制衡并不总是那样频繁和有效。^③

以上两种流派都是从体系层次来回答这一问题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仅仅依靠无政府状态和实力分配这两个变量并不能有效地解释国家的行为;强有力的解释应当把体系层次变量——实力分布,与单元层次变量——政府认知与决策、国家—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新

* 刘志,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国际政治专业2010级本科生。

①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② 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提高政府效率，而且需在战略上和政策上做出有效变革。^①

[整理：陈一一、石宇、胡阳阳]

[责任编辑：胡阳阳]

[校对编辑：陈一一]

· · · · · · 循环论历史观 · · · · · ·

国际政治理论涉及到不同的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就是很重要的一种历史观。

循环论历史观一般持有如下观点：历史由一个又一个或长或短的周期组成，尽管可能存在新变化，但一些基本的规律不变。这种循环既存在于世界历史中，也存在于与世界存在明确区分的区域中。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确定研究对象处在循环的哪一个阶段。

属于循环论历史观的学说包括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国际关系领域的成果则有乔治·莫德尔斯基对霸权周期的讨论，罗伯特·吉尔平、保罗·肯尼迪等人对霸权周期的修补和发展，沃尔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周期运动的总结，等等。

循环论历史观拥有宏达的历史视野，但存在将历史简约化的问题，容易造成思想上的自负。

资料来源：陈玉刚：《超国家治理——国际关系转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2页。

[整理：马焱粮、唐铭兴、姜忆楠、吕海]

^① 国内学者对我国是否应当扩大自身影响力这一问题是没有疑问的。争论集中在扩大中国的实际影响力的路径，特别是交政策是否应当调整，以及怎样调整的问题。

江忆恩

【编者按】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中，有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新生代专家学者，江忆恩无疑是这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位。这位有着中文名字、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了解颇深的学者，以其独到的视角，对中国的战略文化、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情况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本文选取江忆恩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更好地了解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现状有所帮助。

学者简介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加拿大人，现任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政府系教授，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和东亚问题研究学者，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化理论、战略文化理论、中国外交、中国与国际制度等多个领域，被誉为“当今美国新生代中最出色的中国问题专家”。1981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国际关系和历史学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93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2年起于哈佛大学政府系任教至今。



江忆恩的中文很好，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也了解颇深。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中，他大量引用中国古籍，从中国古书《武经七书》与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对外用兵的有关奏折里，对“主战”和“主和”问题进行量化统计，从而总结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内容与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理解。他在2003年发表的《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吗?》(“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一文中，更是通过对中国国家行为的分析，大胆否定了绝大多数美国学者对中国“修正主义”国家形象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朝着更为维持现状的方向发展。江忆恩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家喻户晓，他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江忆恩的主要著作有：《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社会化的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中国，1980-2000》(*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等。此外，他还在各种顶级期刊中发表过大量学术论文。

一、古代中国：中国的战略文化

（一）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

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属于建构主义理论，是在批判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质疑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一个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概念，而是从历史与文化角度来探讨国家战略。在理论上，战略文化挑战了依据对利益和能力的非历史计量进行选择的结构解释；在政策层面，战略文化使得战略偏好和国家利益因目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的情况成为可能。^①

根据江忆恩提出的战略类型划分的两个标准，即“战略类型间的区别要分明”和“涵盖全部或多数合理的政治军事行为”，他提出了将战略文化划分为“和解战略”、“防御战略”和“进攻/扩张战略”三种类型的划分方式。“和解战略”指主要依赖外交、政治贸易、经济刺激、追随、制衡等低强制性政策的战略文化。“防御战略”则在本质上具有更多的强制性，它主要依赖的是国家在外部边界上的静态防御。“进攻/扩张战略”则是高度强制性的，主要依赖越过边界的具有进攻性、预防性、先发制人性或利用优势军事力量实施惩罚的行为。^②

江忆恩对一国战略文化的分析主要使用符号分析（symbolic analysis）和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两种方法来进行。该理论的框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战略文化”进行定义，江忆恩把战略文化定义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通过形成关于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用的概念，从而建立起普遍和持久的战略偏好”，^③该定义使得战略文化可以被证伪和检验；二是通过分析某一国家战略传统形成时期的重要文献来验证某种战略文化的存在；三是验证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即验证该国具体历史时期的决策者是否具有与上述战略文化相符合的战略偏好，以及战略偏好是否对其实际战略选择产生影响。^④

（二）江忆恩眼中的中国古代战略文化

江忆恩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一书是战略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⑤他以明代中国为研究个案，采用设计严格的三步骤检验方式进行实证分析，选取了中国古代兵书经典《武经七书》，明朝的《阵纪》、《草庐经略》和《投笔肤谈》3部军事文献，明朝10位大臣的奏议以及明朝战略行为的一些事例和数据进行文献分析并绘制了综合认知图（composite cognitive map）。具体地，江忆恩先呈现了起源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的政治理想型战略文化，由此推出的核心范式是：“战争是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敌人并非恶魔而是可以被同化和安抚的；暴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应被最后考虑。”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32-64.

^② 李晓燕：《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33-39页。

^③ 同上，第33-39页。

^④ 同上，第33-39页。

^⑤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对应地,也存在一组大战略偏好排序:决策者倾向于首先通过仁政、结盟、和亲、贸易、朝贡、羁縻等和解战略来维护国家安全,其次才是诉诸防御战略或进攻/扩张战略。^①但当他利用绘图认知与符号分析方法解读《武经七书》时,却发现其中存在的核心范式是:“战争是不可避免且极为频繁的;敌人总是准备侵害我方利益;只有通过使用优势兵力才能消除威胁。”对应的大战略偏好排序是进攻/扩张战略优于和解战略。^②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一种是象征性或理想化的孔孟文化范式(Confucian-Mencian paradigm);另一种是实际上被践行的强现实型文化范式(parabellum paradigm),在大多情况下该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在他看来,明代中国的战略文化就是强现实型的,而孔孟文化范式甚至连象征性的作用也没有发挥。

(三) 评价

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在概念界定、实证分析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但也面临了许多抨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江忆恩将军事手段及应对安全威胁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内涵,使得战略一词的概念狭义化,被降到了军事层次,继而战略文化也就与军事战略文化等同了。二是江忆恩对于明代中国的战略文化的定性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得出的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文化是强现实型文化的结论虽然有严格的实证分析,但实际上明太祖及其子孙秉持“十五不征之国”的信条,以及郑和七下西洋进行和平外交等史实都与这一结论不符。三是一些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强现实型战略文化不过是无政府状态的产物,并不是中国国家行为的原因之一。四是有学者指出他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论证存在矛盾之处:江忆恩起初指出战略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在其验证过程中,在承认中国主导文化是孔孟文化的同时却坚持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属于强现实型,将战略文化与主导文化相分离的做法使得两者间的关系变成了并列关系,而不是他起初所说的从属关系。^③

二、当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

(一) “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

在当今世界中,各国对中国的关注日益聚焦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程度上。无论是主张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还是遏制政策,这些政治家或是学者的前提都是相同的,即中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这个前提暗示了这些人认为中国基本上是倾向于改变现状的国家而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自90年代初以来,学界和政界人士越来越多地指出,中国并没有充分地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在学者和政治家的眼中,一个心怀不满的改变现状国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因素,所以主张维持现状的西方大国将中国视为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因而“使中国融入到国际社会中”成了许多国家选择对华政策的标准。

① 朱中博、周云亨:《中国战略文化的和平性——<文化现实主义>再反思》,《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36-51页。

② 同上,第36-51页。

③ 李晓燕:《中国明代战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研究——与江忆恩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66-76页。

一些更加激进的人士则提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低参与率不但意味着中国是一个改变现状国或者不稳定的因素，而且也难以保证中国在进入国际体制后不会故意做出违反体制和规则的行为。

在以上观念在西方社会占据主要地位的情况下，江忆恩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在《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一文中指出：我们并不能确定中国到底是改变现状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国家。主张中国倾向于改变现状的人认为，中国想要独立解决台湾问题并且一直排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而且中国对多极化十分支持，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的不满。针对这些说法，江忆恩指出这种描述方式是现实主义有失偏颇的见解，并没有对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外交事件进行深度的分析。

江忆恩以美国为例指出，由于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可靠依据太少，美国在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方面还处于水平极低的状态，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江忆恩认为中国是一个处在国际社会之外的改变现状的国家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二）二十一世纪中的改变现状国

“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是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政界用语中比较重要的概念，但是江忆恩认为现有的关于两者的定义不仅模糊，而且缺乏理论根据基础。在众多的定义中，江忆恩最赞同的是现实主义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对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倾向的探讨。吉尔平将国际关系游戏规则分解为三个便于操作的组成部分：“权力分配”、“威信等级结构”和“支配或影响国家间交往的权利与规则”。要想判断一个国家根本上奉行的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的政策，需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对一些具体政策、全球或地区性的权力分配问题以及威信等级结构的态度和决定来判断。如果不能确定国家在以上所有组成部分的意图，就不能明确地把一个国家归类为改变现状或维持现状的国家。

为了弥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缺陷，江忆恩提出了自己所认同的5个指标，并将这些指标分为两组：

第一组指标借助了吉尔平关于“游戏规则”的理论，用来检验一个国家具有多大的主动性去挑战国际体系中受大多数国家支持的重要国际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

1. 该国家很少参与那些制约国际社会成员行为的国际机构。
2. 该国家可能参与了这些国际机构，但并没有接受国际社会的规范。
3. 该国家可能参与了这些机构并暂时遵守它们的规则和规范，但如果有机会，它会想方设法改变这些规则和规范，使之与建立这些机构的最初目的背道而驰。

第二组指标检验的是一个国家对看似不利于自己的权力分配格局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

4. 该国对国际体系中的物质权力分配进行彻底的再分配的偏好。
5. 该国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这种权力再分配，因此，军事力量被看作一个重要的手

段。^①

这五个指标是按照从对现状最不具挑战性到最具挑战性的顺序进行排列的。江忆恩依据这五项指标对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外交进行了评估。

(三) 江忆恩眼中的中国

第一个指标是国家对国际机构的参与率。江忆恩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并与一些工业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同时期的外交水平进行对比。他发现从80年代开始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率开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逐步从远离国际社会到走进国际社会。

但是国际组织参与率的提高并不是判断维持现状国家的精准指标,更重要的是对国际规则的遵守程度。江忆恩研究了中国对五大国际规则体系即主权、自由贸易、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民族自决权以及人权的遵守情况,得出在关于国际准则的问题上,中国比过去更遵守现存的国际社会准则的结论。

江忆恩所提出的另一个衡量一个国家对国际现状所持态度的指标是,一个国家是否热衷于改变规则。江忆恩认为证明中国妄图改变规则用以反对维持现状国家利益的证据极其复杂,所以他提出一个快速的检验指标:看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与其他国家投票的一致性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似度指数相当高,与维持现状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似度指数相当低;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相似度指数有所提高。江忆恩尤其指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中美两国的相似度指数最低并且持续下降,但中美关系现状的关键是中美两国利益的冲突。所以江忆恩强调,在判定中国对国际组织的不满程度有多大时,要把中美关系问题同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区分开来。

分析第四个衡量国家改变现状倾向性指标时,必须考虑到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家提出的中国妄图建立地区霸权的状况。江忆恩认为这种声称中国打算改变地区和全球权力分配的说法需要两个前提,即中国领导人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和中国自身力量的实际状况。江忆恩在讨论这两个前提时提到了台湾问题和南海岛屿问题,他通过分析中国一贯的政策指出,中国的长期目标是维护对这些岛屿的主权,而不是破坏地区现状。

最后一个指标是判断中国的外交姿态与它想成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霸主的战略目标是否一致?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对多极化的无比支持正是中国企图改变现状的强有力的证据,但是江忆恩指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太多的具体行动来促进多极化的形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推动军事现代化计划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要发展力量以及阻止或减缓美国军事力量在东亚的延伸。中国并未试图建立反美同盟,或者削弱美国的同盟,也没有试图分裂美日或美韩同盟。

总的来说,江忆恩认为就一个国家在全球主要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而言,中国

^① 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26-67页。

已经融入了各个国际组织，而且合作程度正在逐渐增加，如果没有发生国内动荡或者渐渐形成的安全困境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倾向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三、未来中国：中国外交面对的挑战与难题

（一）中国是否正在崛起？

江忆恩教授认为要判断中国是否崛起取决于衡量指标的选取。他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比例差距与实际差距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就比例关系而言，中国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从绝对数值而言，美国却拉大了与中国的差距。因此在江忆恩看来，中国是否崛起仍是一个尚未回答的问题。然而比中国实际上是否在崛起更重要的，则是中国自身与别国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当已有霸权国与新兴国家均认为后者在崛起时，便会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需要增加双方的透明度与政治互信才能维持稳定。然而当已有霸权国认为新兴国家尚未崛起而后者不同意时，则会导致霸权国过度忽略崛起国利益，崛起国因为不满而更加奋力的情况；当霸权国认为崛起国已崛起而后者不同意时，就会导致霸权国过度反应的情况。后两者不论哪一种都与传统安全困境不同，它们更易引起安全冲突与摩擦，更加难以处理。

（二）“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提出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这一目标更多地是通过参加更多国际组织来实现的。然而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要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正式融入国际社会，就不能仅仅以其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来衡量，中国对于国际准则（主权、自由贸易、核不扩散与军备控制、民族自决、人权）的遵守程度与在“游戏规则”方面的做法也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这显然与中国自身的预期有一定的差距，这样的认知差距必然会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不断的纷争。

（三）民族主义与公众舆论

中国官员一向承认民意是很重要的东西，然而这些民意却并不能通过一个明确的机制影响外交决策，往往只是在领导人上台初期与末期时通过“顺应民意”的方法才会产生一些影响。此外，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与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并非都是有利的，这样的民意极易被外界的批评所影响，从而对外交决策产生不好的后果。江忆恩认为，对于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应该采取一些长期措施，对教育中的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内容进行调整，营造一种更为温和、开明的民族主义。国际社会也应该给予中国更多的尊重与信任，而非猜忌、防范，甚至侮辱。

（四）“和谐世界”与“中国模式”

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江忆恩认为，中国能提供给世界的品牌无非两个：“和谐世界”与“中国模式”。对于“和谐世界”来说，这一观念的核心概念是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而来的，并无新意。与此同时，中国自身军费开支的日益巨大以及同周边国家纷争不断的现状会使得国际社会认为北京在奉行双重标准。尽管中国本身不是出于挑衅的目的，但国际社会的观点却已经决定了这一观念很难有大的影响。

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则一直就备受质疑。中国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曾经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发展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未来的中国也一定还会产生很多不可预知的变化，即便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应该是以后的事情。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将会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意识形态，这种说法的正确与否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质疑无疑暴露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依然很弱的事实。

[整理：姚丽丽、江昊宇、李 萌、李安琪]

[责任编辑：宁鹏举]

[校对编辑：任 娟]

· · · · · 埃克塞特大学 · · · · ·

埃克塞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创立于 19 世纪中叶，是位于英国的一所知名的传统公立综合型大学，埃克赛特大学于 2012 年被批准加入英国大学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

埃克赛特大学是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学术研究水准有着较高的声誉，尤其在社会科学、文科和艺术研究等领域，有着悠久的传统。并且，埃克赛特大学在 2014 年 TIMES 英国大学排名中，其政治专业排名全英第 5 名。如果想要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所建树，埃克塞特大学能提供非常不错的专业环境。

埃克塞特大学已经与数所中国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并签署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包括多所大陆院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3 所中国香港院校：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1 所中国台湾地区院校：国立政治大学。

埃克赛特大学有来自 130 多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其中中国学生占国际学生的 30%，在该大学里存在一个名称“埃克赛特中国学联”的组织，帮助中国学生更好地融入当地的学习生活，同时，埃克赛特大学能够提供一流的教学、科研设施，同时又能保障学生享受到友善的氛围及足够的私人空间。因此，对于有意愿求学于埃克赛特大学的中国学生，埃克塞特大学是个不错的选择。

[整理：马焱粮、唐铭兴、姜忆楠、吕 海]

社会科学的价值是什么？

——对学者和政府资助者的挑战

亚瑟·卢比亚*

非常荣幸受邀进行此次“以帖·德·索拉·波尔”(Ithitel de Sola Pool)讲座。波尔教授在学识和实践方面的有着巨大影响,他的作品论述了不断发展的技术对交际预期及社会效益的改变方式。在出版了这些作品的许多年之后,诸如《自由的科技》等后续作品继续深入分析了网络通信正对世界做出的改变,因此可以说波尔教授的工作仍有极大的公共价值。而在下文中,我将重点阐述当今社会科学的价值。

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价值是什么?国会继续对其进行经济资助是否值得?近年来,这类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很多人最后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削减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的提议,其关注点主要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一些官员曾经质疑 NSF 究竟为何要对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投资,而另一些人还曾试图限制 NSF 可以资助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的形式种类。在 2013 年,一份要求建立对 NSF 政治科学基金的特殊标准的申请被成功附加到一份持续决议案中,并且在本文撰写时该决议案正在形成法律。

这些行动受到了众多质疑,也受到《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这两大期刊的极为强烈的批评。《自然》的一篇社论反对国会对社会科学开展长期支持背后的潜在政治动机的调查,指出要求限制对政治科学的资助的修正案“与对土耳其和伊朗的学术自由的意识形态侵犯没有本质区别”。而《科学》出版了一篇题为《科学安全吗?》(*Is Any Science Safe?*)的封面文章,文中对社会科学的显著公共效益进行了分析,指出国会提出的限制自助社会科学的一些提议可能会对国家军事、医疗以及政府效率产生威胁。可见,这两大权威期刊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不谋而合。

但是,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对这些挑战却仍然保持沉默。许多人希望其他人能消除造成联邦政府有关资助社会科学基金的质疑,但这是不可能的。关于社会科学公共价值以及国会是否应该向其提供资金的争议不会停止,因为至少有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为回答这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分别提供了动力支持。

一种力量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庞大规模及影响。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相比过去任何时期而言,建立的话题更多,探求的方面更广,使用的方法更复杂,针对的受众更广泛。在美国,这类研究的支持不仅来自 NSF,同时还广泛来源于众多不同的政府机构。在联邦政府一级,社会科学对于保证一些重要部门——比如国防部门、州政府、国土安全部等——的实际运作

* 本文是亚瑟·卢比亚(Arthur Lupia)教授在“以帖·德·索拉·波尔”(Ithitel de Sola Pool)讲座上的演讲,来自 Arthur Lupia, "What Is the Value of Social Science? Challenges for Researchers and Government Funder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47, No. 1, January 2014, pp. 1-7. 亚瑟·卢比亚是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的研究型教授,也是密西根大学政治系的哈尔·R·范里安(Hal R. Varian)教授。他在舆情形成、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的邮箱是 lupia@umich.edu。

非常重要。社会科学在许多地方政府中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影响并辅助形成了大量的决策。

另一种力量是现代社会科学的花费。社会科学家擅长于针对大量不同种类的现象提出有效可行的结论，这种有效的研究需要准备充分的学者，而这样的准备通常需要大量的培训，以及众多高技术人才团队参与其中来帮助其他人提升技术。在这样的时间及精力投入下，培训必然是代价高昂的。此外，社会科学家还被要求创造精确科学的工具。这些由美国人口普查局一类的机构执行的数据收集及分析，以及在军事操作中应用的战略性及战术性计划，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出及长年累月的时间投入。

当支持社会科学培训及产品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资源，关于是否应该由这类投入的收益决定纳税人支出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进而产生了对于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的怀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这种社会效益并不总是直观明显的。翻译问题，以及基础学科和应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问题，是导致社会科学价值难以被感受到的主要因素。

关于翻译，大多数社会科学作品均以科技语言写就。这种语言，尽管较普通语言而言使得对概念和关系更为精确的描述成为可能，却使科学家以外的人难以理解。尽管科学作品常常被需要用来揭示重要社会现象的密码，社会科学家却常常拙于解释这样的作品如何对社会有益。社会科学家并未接受例行训练以有效传播其科学发现之价值。许多人缺乏使其作品对更更容易被大众理解的职业激励。对于希望得到政府资助的社会科学家而言，培训及雇用社会科学家的组织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有效的展示技巧上。

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些社会科学貌似与重大社会问题之间并无直接、明显的联系。例如，一些研究被定位于揭示社会世界中的基本机理与过程。社会科学家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去解释这些“基石性”发现是如何同重要现象、有关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相联系的。当然，基础研究具有重大价值。我们的社会已经在多方面被其改变。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个事实。同样无人能否定的是，也有一些几乎没有或不存在影响高价值公共产出可能性的研究。对社会科学的挑战帮助我们自身和其他人更好地理解两类活动间的差异。因为当纳税人和国会代表询问有关表面上令人费解、在公共收益上不能很好得到解释的研究的价值时，他们确在尽职监督。尽管学者可以自由从事相关研究，但公众也有权决定是否为此买单。当社会科学家不能给出关于其作品公共价值的有力证据时，“不买单”的支持者的任务就是使政府资助变得难上加难，并且那些希望将社会科学定义为蠢物的人们的工作也因此变得更为简单。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等待其他人来化解。对我们而言，保证社会科学的政府资助不能仅仅成为其受威胁时的一个任务。传达社会科学与高价值产出的关联性是我们必须永远自觉参与的活动。

在此精神下，我将提出一个关于社会科学公共价值的理由和一个争取国会资助的无派别的依据。对于这些评论，我将从两个假定入手。我的第一个假定就是支持对社会科学资助并非社会科学家得以冠名的原因。正如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前主席马修·霍尔顿(Matthew Holden)在协会内部的雄辩演讲中所解释的“不是每个人都如我般能看到我们作品的价值”。由此假

定出发,我得出了一个明确表达社会科学价值的框架。我的第二个假定是宪法中没有任何内容要求国会资助社会科学。从这个假定来看,我强调获得宪法性资助的依据必须来自宪法的另一部分,并且为此提出了一个框架。

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价值是什么?

决策者通常面临复杂的挑战。对于在安全、健康以及经济之间不断变化的主题,许多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在追求更高的有效性和效率时都有寻找最优可行信息的激励。通过一个适时和可用的框架以提供必要信息,并以可信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形式呈现出公共投资对于大部分公共和私人决策者的成功,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科学家调查关于政策制定者和私人部门决策者所关心的大范围现象。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出一系列强大的方法来收集和分析多种多样的数据。社会科学已创造出可供大多数人用以严格评估关于重要事件的冲突性解释的可信和精确的方法。当世界范围内的个人和机构在社会和行为领域对原理性声明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尚抱有疑问时,社会科学为最优可行办法准备了大部分的知识基础。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已经获得了比他们能用到的更多的信息。当政策制定者能在多种信息资源中选择时,他们政策的质量就能取决于他们选择相信哪些信息、忽略哪些信息。那些目标和志向是为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就更多地从各种选民和利益团体中获取信息,这些选民和利益集团提供关于政府某种行为会导致什么结果以及政府应该做什么的广泛意见。这些意见给我们的民主以巨大的能量,但是当提到发展和实施有效的方法来服务公众的时候,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与政策的成败是有区别的。

可以区分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的一个原因是社会科学为真实地描述社会和行为现象的特征提供了可增长的能力。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个描述可能看起来很奇怪。毕竟,一些社会科学的分析是那么复杂以至于他们使事情复杂化的情况比他们澄清的情况还要多。正如马克·吐温在1906年的言论,“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数据”。

正是其程序透明度的规范给了社会科学与众不同的潜力来扩展我们追求真实的能力。我坚定地认为,关于社会科学的公众价值可以建立在“它的声明是如何被提出的”这一信息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提出描述性推论、因果推论和对于事件的超出数据搜集意义上的演绎。可信的社会科学结论是根据对于个体能否宣称认识世界进行了严格反省的方法得出的。当研究者对于这些他们用来提出或评估他们结论的程序很明确的时候,他们赋予这些结论的意义是其他人可验证的。这样的流程给社会科学家们一种能力,去告诉公开或私人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一些他们不能独自发现或严格验证的有关世界的信息。

社会科学求真能力的增长来自于研究者宣扬从特定的观测集合发展为社会世界的特定结论的途径的意愿和能力。事实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的焦点预期是,结论的意义不能取决于发表声明的人或者不可重复的程序。正如金(King)、基欧汉(Keohane)和维尔巴(Verba)描述的那样,科学研究的标志是“目标是推论”、“程序公开”、“结论未定”以及

“方法构成（科学的）内容”。所以，如果社会科学研究的读者可以合法地参观流程，那么他们就有评估声明的结果的根据。当既定利益集团用对自己有好处的方法去阐释重要事件时，这种求真的能力就非常珍贵。举个例子，考虑一下接下来几个月将发布的经济数据，以及随之而来的很多阐释。政府的支持者通常声称数据是他们成功的证据，而政府的反对者声称那是政府失败的数据信号。此时，社会得益于从持续透明的有逻辑且可以获得的证据中辨别真伪。社会科学可以提供这些益处。

虽然社会科学能够提供重要社会现象的准确可信的理解，但它也并不总是能够这样。社会科学家正在更多地关注研究透明度的问题。通过社会科学，在更多的案例中有研究被认为不能被复制，并且在几个案例中存在欺诈事例。学者们搜寻平衡社会科学合法性的方法，这个合法性来自于对于如何提出知识的透明度的讨论。这些学者追求一系列可以使分享科学流程的数据和信息更简单并且更有吸引力的项目。心理学研究中的“可再现性项目”（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和政治科学领域的“数据获取和研究的透明度”（Data Access and Research Transparency, DA-RT）都是帮助学者记录他们如何得到其所指结论的广泛合作中的范例。

社会科学不仅宣称拥有有价值的用以产生高度真实的知识的程序，它还愿意并且能够把这些程序公之于众。反过来，透明度产生自我修正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复制可以揭示错误，并且复制的可能性促进严格的研究。这种公开性把科学同许多其他的与社会和行为话题（例如，新闻报道，利益集团的声明）的信息源泉区别开来。社会科学使决策者能够做出更好的决断——应当相信哪种断言——的能力。当社会科学在重要的社会决策的背景下提供这样的机会时，带着对可靠的数据和可复制逻辑的尊重，它帮助公共和私营部门评估自己的感情和信仰，来为社会提供价值。

政府对社会科学的支持为它的公民将关于世界的广泛信息转化成可操作的见解提供了机会。今天，在社会价值领域，许多私人 and 公共部门的人们利用这些知识来提高产量和效率。除了告知政府活动，社会科学还帮助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宗教机构、社区团体和教育事业更有效地完成它们的使命。这些组织利用科学来理解无数复杂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直觉或对过去的事件的误解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社会科学可以用逻辑和证据帮助我们评估这些信念。

举个例子，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从伊拉克战争的战略中所了解到的社会科学扮演的角色。2003年，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入侵伊拉克。在数周内，这些部队获取了对巴格达的控制权，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从权力之巅坠落。虽然很多人希望入侵会在伊拉克产生相对快速和平稳的权力过渡，但是在入侵后的岁月里却充斥着叛乱和无数宗派暴力。在很多方面这都是一个悲惨的连续事件。

2007年，美国开始在巴格达实施一项新的军事战略。该战略的基础是“增压”（surge）——通过增加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培训而大规模增加在伊拉克地面的军队数量。在2008和

2009 年, 在巴格达和其他重要地区的暴力活动数量显著下降。当民选官员、军方人员以及公众试图了解伊拉克此事件的顺序时, 问题徘徊于军队的增压和暴力活动的下降关系上。虽然一些领导人声称军队的激增导致了暴力的下降, 但却有人把这一结果指向其他的因素。他们指出, 很多在巴格达的暴力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彼此攻击造成的。当彼此的攻击升级后, 宗教移民模式就开始了。鉴于 (美军) 入侵伊拉克之前逊尼派和什叶派往往比邻而居, 是 (不断增加的) 暴力导致了数量众多的宗教分离。逊尼派开始迁出自身人数大大少于对方的居民区; 而什叶派也一样。一些分析家声称, 并不是军队的激增导致暴力的减少, 而是同质的种族聚居地开始增多, 并由此导致宗派接触减少, 才导致宗教暴力的减少。

由魏德曼和赛尔海因主导, 并部分地受到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 (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资助的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阐明了应对种族冲突的军事战略。魏德曼和赛尔海因从各种不同的来源收集了三项详细数据: 巴格达居民区种族构成,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社区居住模式的变化, 以及随着时间推移暴力行为在每个居民区的数量变化。魏德曼和赛尔海因使用一个计算模型, 以考察巴格达城内和跨巴格达的不同种族的人口移动与暴力行为的时间和性质之间的相关性。这种评估让他们认识到: 暴力-迁移之间的对应关系与现有的最佳数据是一致的。有了这样的成绩在手, 魏德曼和赛尔海因模拟各种警务战略的影响。这种模拟让他们能够产生和评估部队人数的激增是否以及如何 (控制暴力活动) 变得有效。

他们的发现很好地揭示了增压前后的巴格达。他们的数据说明大多数攻击都是针对附近的宗派敌人。如果一个少数宗教派别的人身处在攻击发生的附近, 他们会选择去本教派人占多数的地方保证自己的安全。通过多种方法检验, 他们的分析清楚说明暴力导致的宗派迁移在减少巴格达暴力上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结果还提供了关于增压的重要观点, 即时机问题。他们的研究支持关于其所追求的浪潮发生在冲突的早期阶段会更有效果的假设。直觉是如果增压延迟了, 个人和倾向暴力的组织就会积攒暴力行动的合理性 (针对他们成员的袭击进行复仇), 而且会有助于组织其资源, 以提高暴力的有效性。当组织拥有了合理性和资源, 军队就必须为降低暴力等级付出更大努力。

诸如 Weidmann 和 Salehyan 的发现尽管深深根植于研究, 但不仅仅是学术工作。军事行动对于执行策略的军人具有相当大的危险。当军人的牺牲近在咫尺, 依赖直觉和思考其执行任务的有效性的理想想法就是不够的。此时, 这些个人和我们的国家从不同的关于原因-影响的虚假故事和逻辑准确证据确凿的解释当中获益。这种类型的活动正是特别需要社会科学识别和支持的活动。

社会科学也证明了在告知公众和私人部门关于最有效和最有影响力地提高公共卫生的方法方面的作用。一个我曾经亲历过的例子说明即使小笔资金也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在 2001 年, NSF 资助一个标题为分时实验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基础设施项目 (Time-Shared Experimen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TESS)。Diana Mutz 和我是首席创始研究员。

TESS 邀请研究人员来进行关于大国家受访者的样本的创新性实验。那个时候大部分社会科学实验是在学生和大学城居民中进行的。TESS 给调查者接触更多样化人群来衡量社会科学调查的假设的机会。

在这个项目的前期,我了解到一个年轻博士想要知道这些方法是否能够帮助医疗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更有效地帮助病人。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种选择,随后他立即向 TESS 提出了申请。经过 TESS 的几个月的审查,我们开始进行研究。这个问题涉及了批准病人使用疫苗的最佳方式。

研究中,雇主资助的健康计划是儿童和成人健康保险的主导资源。一个典型的计划是雇主和保险公司之间协商的结果。雇主和保险公司会达成一份关于确定时段的获益、比率的合同——这个过程经常花费数年时间。

在这个合同期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会定期检查新疫苗对公众健康的益处。这些新疫苗在现行合约当中很少涉及。因此,大多数美国人都需要等待几年才能等到保险公司包含新批准的疫苗。

Matthew M. Davis 和 Kathryn Fant 在 TESS 的研究检查了公共卫生的结果和环境。他们的研究比较了公众愿意为新疫苗买单的意愿和一种获取收益的替代方法。在这种替代方法中,公民愿意提供被经济学家称为期权合约的东西。David 和 Fant 询问人们是否愿意每个月付出一小部分附加的费用(3-6 美元)以便立刻使用新疫苗。

这项研究揭示重要信息:虽然少于一半的参与者愿意支付新疫苗,但是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会支付该期权合约。结果的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有益于提升公众的疫苗接种率,而且据此保险公司可以提供真实花费的报告。在研究中参保者每月提供 3-6 美元的附加保费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故意过高估计的花费。事实上,对新疫苗最大影响的最合理估计只有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期权合同中提及的花费的十二分之一。换言之,研究展示了很多愿意付给保险公司每月 3-6 美元来支付只需花费保险公司几美分的服务,这可以促进重要公共卫生服务的提升。

本课题虽然植根于研究中,却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寻找有效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卫生保健的方法对许多公司,以及——对此会有很多争议——作为整体的国家,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的公民的健康岌岌可危,依靠直觉或一味相信各种健康策略的有效性是不够的。此刻,这些个人和我们国家从虚假的因果故事和具有由精确的逻辑和能获得的最精确的证据组成的解释的区分中受益。NSF 识别和支持这种类型的特殊活动。此外,研究 TESS 的博士也在他的工作中继续整合社会科学方法和公共健康问题。他现在领导国家儿童健康调查,帮助许多医生和病人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共同努力,改善儿童身体素质。

国会应该资助社会科学研究吗?

在最后一节中,我想重点谈论我在最近几个月已经多次提及的一个话题。正如你所知道的,国会是否应该、(如果应该的话)如何资助社会科学研究。最近,我得知了一个关于取

消 NSF 所有社会和行为科学首长的法案，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等部门急需社会科学家来帮他们完成相关任务，所以对于纳税人而言，他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持有不同态度。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妨先想想国会的职责是什么，然后再思考一下，这样做是否有利于国会实现其职责，按照宪章所写的，国会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国防，促进我们和后代福利和安全”。明白了国会在资助社会科学研究上的角色，我们也就明白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帮助国会实现其目标。

科学在美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科学发明帮助我们过上了更舒适的生活，科学使我们的工厂效率更高，我们的农场更富足，我们的军队更强，我们的医生就能更好地拯救生命。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科学界的全球领袖。美国的科学领导能力不是偶然发生的。美国的科学领导能力十分得益于国会的远见，特别地，国会创建 NSF 给美国以研究公共利益的能力，使得美国广受赞誉。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过程，NSF 通过支持评估科学竞争的研究带来复杂主题的好的判断力。在许多情况下，NSF 选择资助高度竞争性过程的提议。在每一个竞争中，它都提出了国家利益的问题，要求研究人员带来最好的可用的科学方法来承担。NSF 这样做，是因为它知道当科学家们自由严格评估竞争理念时，知识更新换代更快。自由和竞争提供了科学创新力和领导力出现的基础。

正如前文显示，社会科学的研究为国家提供了巨大价值。但是国会应该要为此付钱吗？让我说，国会没有义务在科学研究上花一分钱。它的责任是在宪法的框架下为美国人民效力。所以我们不得不问的问题是，“国会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对美国人民的义务是否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说，社会科学是有价值的，但国会不必为其提供资金是可能的。这个想法值得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像“政治科学”这样的术语听起来奇怪。对一般市民来说，很多政府的许多政策似乎并不科学。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用科学来理解关键要素，如现代社会如何组织自身以迎接重要的挑战，比如为什么我们有时无法成功，这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充分的证据表明，支撑性的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当这个社会想变得更加高效和美好时。

然而，有些人声称，我们不需要科学就可以了解政府和政策，因为人们在没有科学知识的基础下也可以解释这些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正确的，美国人解释政治、政策都采用许多不同的方式。然而，这些人在陈述时，往往强调他们向往的世界，他们对于客观的评价并不感兴趣。当人们的生活受到威胁时，我们的国家将受益于从各种解释中区分出何为真何为假，真相往往具有清晰的逻辑和可信的证据。

其他人声称，私人部门将资助基础的科学研究和政府。不可否认，许多公司用社会科学研究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但大多数企业都有非常具体的利益，而没有意愿支持广泛且有益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搭便车问题”，搭便车问题将解释为什么先进的社会利用政府（而不是等待自愿捐款）来完善司法系统，修筑州际公路和培养士兵。作为

公益性、基础性的社会科学不太可能由私营部门提供足够量和程度的资金。所以，当谈到促进公众科学价值时，主要国家都选择用国家科学基金会来解决搭便车问题。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已经一马当先。但我国是否应该继续这样资助呢？

鉴于社会科学的投入可能比较巨大，我们应该想到那些决定退回投资的人。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用许多方式解释，其中社会科学提供了关于社会治理方面的很多有用的介绍。它有助于社区、城市、州和国家更好地服务人民，它可以帮助我们完善多民族国家的优先权，如国土安全和创造就业机会。社会科学通过知识而不是未检验的故事来提高我们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在美国作用日益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为接下来的争论做准备。社会科学家经常研究的是人们有强烈的意见的课题。对于那些研究政治和政策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更是这样，因为在某些领域，很多人并不喜欢被告知一些数据和证据来支持他们热衷问题的其他看法。正在这样的观点面前，社会科学家可以期待许多类似“在描述社会现象上，是否科学是否比媒体评论员、利益集团和政治家解释得更好”的问题。然而，社会往往受益于不同资源的交流和具有清晰逻辑和可靠证据的政策，而社会科学是培养一种“可以用可信、合法和严格的途径获得清晰逻辑和证据”的能力。经验知识、技术上精确的分析可以提供最强大的智力支持，也可以明晰目前行动的未来影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支持社会科学变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希望实现快速发展的国家而言。

[整理：胡阳阳、李 漩、刘 志、王 燕、杨 雪]

[责任编辑：裴 瑶]

[校对编辑：姜忆楠]

第四届“全国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征稿通知

为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搭建起各高校间资源共享与合作的平台,由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自主发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办、《新视界》编辑部承办,华东师范大学《闻道》编辑部协办的第四届“全国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将于 2014 年 7 月在南开大学举行。

前三届论坛已有多篇参会论文被《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等核心期刊录用,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我们力求将本届论坛办成优秀的学术论坛,为全国的国关学子搭建属于自身的学术交流平台。在此热忱欢迎全国各地兄弟院校的研究生积极参与,踊跃赐稿。

现将论坛相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论坛主题:“国际关系现实与热点问题:理论、方法与实践”

二、时间:2014 年 7 月 13 日

地点:天津·南开大学

(详细时间、地点会在会议日程中公布)

三、参会对象

全国兄弟院校国际关系及相关专业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

四、论坛组织

本次论坛设立由南开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代表组成的秘书处。秘书处统筹负责此次论坛的论文征集、评选工作及会议的具体组织实施活动。届时将有来自业内的知名专家学者对与会者的论文进行点评与指导。

五、征文与参会要求:

1.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大国崛起与周边关系:理论、历史与实践”,在论坛主题之下,将设立“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现实与热点问题研究”分议题。

2. 请各位欲参加论坛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在 6 月 30 日 24 点之前向论坛秘书处提交论文或研究设计。秘书处将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匿名评审所提交的稿件,并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决定入选稿件。7 月 4 日前,论坛秘书处将公布入选的优秀论文,我们会以电子邮件方式致函入选论文作者。入选论文的作者将受邀到南开大学参加论坛活动,所有论文届时将根据主题及论文内容编入相应的分议题进行讨论。

3.所提交的稿件要求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原创性,字数以 3000 字以上为宜,论坛不接收已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论文。严禁一切形式的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4.为加强学术规范,行文请参照附录《世界经济与政治》注释体例。

5.主办方将提供外地参会代表食宿费,并向参会代表所在单位发送邀请函。

6.入选稿件在会后经修改将汇编成册,优秀论文将推荐在相关领域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作者同时将获赠出版论文集与荣誉证书。

六、联系方式

1.报名表、投稿等请提交至论坛秘书处,电子邮箱为:gradforumofir@126.com。邮件主题请以“投稿—姓名—学校”格式命名,报名表、投稿请以附件形式发送到论坛秘书处邮箱,以方便秘书处整理。

2.本次论坛秘书处联系人:

南开大学董柞壮 电话 13502191501 邮箱 dongzuozhuang@qq.com
南开大学刘芮宁 电话 13652000171 邮箱 wodebaiaixing@163.com
南开大学姜忆楠 电话 15122751186 邮箱 jiangyinan1990@163.com
华东师范大学蒋霁望 电话 18521508883 邮箱 jjwzgrmdx@126.com

主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承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

协办: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闻道》编辑部

更多信息欢迎大家关注新浪微博“南开国关新视界”或加人人帐号“南开国关”。

【编者按】暑假将要到来,各位同学大概已经对各种项目眼花缭乱。这次栏目组为大家选取了两位参加 2013 年国际政治研究协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方法论暑期班 (IPSA-NUS Methods Summer School) 的同学的心得体会,仅供大家参考。如果你希望与作者作进一步的交流,可联系本刊编辑组!

新加坡暑期班见闻

董柞壮*

2013 年 7 月,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路辗转,经由深圳和香港,于午夜时分到达狮城,参加国际政治研究协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方法论暑期班 (IPSA-NUS Methods Summer School)。我修的课程是“回归分析”(Modern Regression Analysis),主讲老师是德州农工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 一位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教授。课程并不算紧张,每天 9 点到 13 点上课,下午 2 点到 4 点小组作业,其余的时间都归自己支配。因此,我们也有充分的时间来了解这个国家,包括它的美食和文化。

参加暑期班的人多数已经取得本科甚至博士学位,主要来自亚洲和欧洲,这样一个比较多元的文化背景有利于我们了解不同地区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况。就我个人的体验,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明一下。

首先,实证研究方法似乎在亚洲和欧洲都不算发达。即使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这些亚洲顶级高校,纯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也很少,利用定量方法的师生并不多。在该领域,美国人仍然是当之无愧的领导和主宰。我们虽然与美国在实证方法方面存在差距,但是与亚洲和欧洲的顶级高校差距并不大。并且目前国内很多人开始重视这方面的训练。所以,如果我们肯花时间在这方面,向先进国家学习更多的经验,取得更大的进步,那么我们无论是师生还是学校,在与美国之外的高校师生进行竞争时将会具备非对称的优势。以后无论是外出交流还是继续深造,这都将是取得成果的有力因素。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领域有一些有意思的趋势。尽管可能不算最前沿,但是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在统计方法领域的贝叶斯推理 (Bayesian inferences) 的应用和兴起;比如文章和研究中应用地理信息技术 (GIS) 等可视化技术,以及使用统计软件制图等;要掌握多样化的方法工具,比如定量分析、比较定性分析 (QCA)、实验方法、博弈论等,暑期班都提供了这些相关的课程,也从侧面说明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方法的多样化进一步加深。

第三,参加暑期班让我领略了美式课堂的风格。课堂上的讨论很多,但是东亚的学生(中日韩)的学生很内敛,发言非常少,与老师的互动也不多。这固然是一个文化问题 (Culture

* 董柞壮,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3 级硕士生。

Issue)。然而，如果在课堂上多数人都会参与讨论，我们自己也会被环境所感染，或多或少的开始参与。所以，我觉得问题并不仅是文化的问题，更关键的是语言的问题。在课堂时有想法却不能表达是一个很囧的状况。我自己也深受其扰。所以，我觉得除了跟踪最前沿的方法和趋势，还要打好语言的基础，这是基础性的工作，需要我們不惜代价去做好。

第四，结合最近从老师和同学那里了解的情况，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着手去做。比如在国际会议上，对中国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但是中国人的参与并不多，外国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客观工具。此外，在国际顶级期刊发文章，大多需要原创性的资料来源。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去收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材料，包括数据和记录等。这将是中國学生与外国学生竞争时的另一个非对称优势。因为对中国的讨论远多于对其他 G20 国家的讨论，中國人有自己的先天条件来取得这一优势。

此次远行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增长了自己的见识。从北京一路火车到深圳，贯穿黄河和长江，走过了半个中国，到了喧闹的深圳，有序的和香港和美丽的狮城。小小的新加坡竟然囊括了牛车水（中国城）、小印度、武吉士（中东城）和荷兰村等，因此地盘虽小，却也有移步换景的感觉。当然，新加坡也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师生之间、同门之间淡漠的人际关系，以及无处不在的家长式政府。

最后，南开有“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传统。我们只有通过对比中国不同的地区、中国与外国的差别，取长补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及其变迁，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所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看一看，学习一点新的东西，尝试一点新的味道，亲眼见见那些曾出现在梦中的美景。

新国杂感

何睿*

2013年7月6日至19日，本人赴新加坡参加了由新加坡国立大学（NUS）与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联合举办的方法论暑期班，除了系统学习定性比较方法（QCA）这一方法论工具，也有幸在闲暇之余感受了新加坡与国大的风土人情。细碎杂感，在此与诸君分享。

关于新加坡：制度与繁荣

对于国人而言，新加坡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如同其它南洋国家一般，有着丰富的绿色与清澈的海天。而其在威权体系与廉政建设、多元文化与独立自主之间奇妙的后天平衡，也

* 何睿，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2 级博士生。

令很多国家称道。尽管区区两周只能窥豹一斑，但日常中的琐碎还是可以反映出这些属性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众多特色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秩序的井然。新加坡市区人口稠密，高峰时段的景象堪比北上广，但无论是地铁通道、自动扶梯还是过街天桥，人流总会分为左行与右行，同一方向的人流又总会分为快行与慢行，因此即便是在最拥堵的时段，也可以畅行自如。新加坡市区汽车密度同样惊人，但在两周的时间里，仅听见三次汽车鸣笛。而且机动车避让行人的意识十分强烈，无论车速车牌，只要司机察觉到行人想过马路，哪怕我仅是停下向对街望一眼，从大货车到保时捷，都会减速让行。良好的秩序，显然不是因为新加坡聚集了世界上最善的那一撮人，而在于其拥有十分严厉但又一视同仁的法律。由于力行“没人情”的制度，新加坡拥有了“有人性”的社会，而这是与之拥有类似规模的许多国家或城市所未能做到的。

当然新加坡的制度绝非无瑕，其在个人自由限制、外来劳工待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其多元社会的构建、经济的繁荣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但无疑新加坡人通过后天努力打好了手中原本并非上佳的牌点。国家兴衰在人为，在我看来，这也是新国被誉为鱼尾狮而非狮尾鱼的奥妙所在。

关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多元的学习环境

两周中我们主要活动的区域，是 NUS 较新的校区 U-Town，它与主校区一桥之隔。在这里学习与居住的多是国大的研究生与各类暑期班、研讨班学员，通过乘坐免费大巴可以比较快捷地到达位于主校区的图书馆、体育馆、政治学系等地。当然步行的话也是很好的选择，可以欣赏到各类热带花卉，以及有趣动物，例如奔跑的小鸟与飞翔的壁虎。

由于 NUS 国际化水平很高，加之新加坡本身即是多元文化国家，所以在国大校园生活学习的好处就是，你将有幸听到各种口音的英语（不得不说华人的口音是相对较好的），以磨练自己的听力口语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今天与你共进午餐或同桌自习的同学来自哪个国家，有何种肤色，信奉何种宗教。这就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交流创造了条件。由于身处南洋，国大拥有较多来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学生，你将有机会同这些来自中国邻邦的学生学者就许多话题开展讨论并交换意见，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以我所在的班级为例，除了来自德国的导师，12 个学员包含了来自新加坡、印度、缅甸、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或地区的学生、教授与研究人员。同他们的对话令我对自身与他者有了更为立体的认识，期间诸多讨论是思考中国地区角色的很好的切入点。通过交流，我感到即便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今，因国界所造成的陌生感或神秘感依旧是深刻且广泛的，而面对面的对话依然是填补这一鸿沟最为有效的方式。

关于定性比较研究方法 (QCA): 量化的定性研究

本次漂洋过海的主要目的是学习 QCA。本届暑期班总共设立包括 QCA 在内 7 种研究方法课程供学员选择, 每人限选一种。两周课程的安排大致为上午课程讲解, 下午软件演练及小组讨论, 傍晚专家讲座(自由参与), 最后三天会有部分学员进行研究设计展示。

同回归分析或博弈论相比, QCA 不是常见的分析工具, 其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布尔代数法则的比较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定性研究工具, 它具有严谨的形式并且同样需要数据支持, 因此是一种可供重复检验的分析方法。较之定量研究, QCA 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用于处理具有较小或中等规模样本数量的多案例比较, 在理解每一个案例复杂性的同时, 不受可能存在的极端值的干扰。拉金(QCA 之父)将其称为一种介于案例导向的(或称“定性的”)与变量导向的(或称“定量的”)研究路径之间的中间道路。另一方面, 同所有的研究方法一样, QCA 也有短板, 对结果(outcome)的二分要求、对时间序列的忽略和在获得数据以及标准化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限制了其应用的范围。不过, 没有错误的研究方法, 只有错误的使用方式, 在明辨利弊的基础上, QCA 在国关领域的发展空间还是相当巨大的。

这一课程的负责老师是德克·贝尔格-施洛瑟(Dirk Berg-Schlosser)教授, 其是 IPSA 的前副主席, 也是 QCA 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的授课方式深入浅出, 兼顾理论与应用, 很适合初次接触 QCA 的学生或学者, 同时他“没有愚蠢问题, 但可能存在愚蠢回答”的口头禅也鼓励我们随时提问与质疑, 加深了我们对这一系统比较方法的认识。课程结束之时, 我有幸获得向全班同学展示研究设计的机会, 主题是“二十国集团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分析”, 经过各半小时的个人陈述与提问时间, 教授对于这一设计的评价是“Dangerous, but meaningful”, 并开玩笑将其喻为中文“危机”一词, 鼓励我继续这一研究, 但一定要以足够的数据作为前提。

总之, 通过此次新加坡之旅, 我在学习研究方法的同时, 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并对研究充满了热情, 这些经验与鼓舞将伴我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与生活

[责任编辑: 沈琳]

[校对编辑: 王芳琳]

【编者按】本期收录了一篇关于改善天津市空气质量的文章。作者首先介绍了天津的地理位置及其重要性，并由前不久的雾霾天气、PM2.5 引发对天津空气污染的担忧，接着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进行反思，进而提出改善天津空气质量状况的建议，表达对解决天津环境问题乃至世界环境问题的强烈关切。

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Air Quality in Tianjin

Jiadong Li*

Tianjin, one of China's fou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imply known as Jin which is situated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bordering the Bohai Sea in the east, leaning against the Yanshan Mountain in the north, with its terrain traversing the Haihe River through north and south. It has become the hub of communications of North China and the gateway of the capital city. However, with the fast pace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ianjin's air condition is not optimistic. The increasing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private cars are the significant causes of the air pollution. What's more, the expanding population, the location which is nearing the northern industrial base, the limited vegetation and rainfall together worse the air condition. As a result, people in Tianjin experienced the terrible hazy weather for a few months, which forced people to wear special masks to prevent the PM2.5's violation of human body. In a word, the air pollution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it is time to take some instant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Like the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 where several states have a meeting together in order to solve or mediate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 we can also hold a conference by the Tianjin government. People attending this meeting are not the countries' leaders, but the leaders of various aspects, especially the main industries or companies, which largely depend on the environment. Nevertheless, the problem of negotiation through the form of summit has been revealed. The Copenhagen Summit did not reach a meaningful and constructive outcome. It was reported that only a "weak political statement"^① was anticipate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The document is not legally binding and does not contain any legally binding commitments for reducing CO₂ emissions. A UK official comment complained "With no firm target for limiting th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no commitment to a legal treaty and no target year for peaking emissions, countries most vulnerable to climate impacts have not got the deal they wanted."^② In this conference, the climate issues become the interest combat between the developed and the developing. The poor blamed the rich for the monopoly of the resource and

* **Jiadong Li** is a juni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① Dimitrov, R. S, "Inside U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Vol. 27, No. 6, November 2010, pp. 795-821.

② Ishita Haldar, *Global Warming: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ind Melodies, 2011.

technology; the rich blamed them for the amount of the emission of the CO₂.

In fact, the anarchy st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above negative results. Lacking of a global superior leading power, all countries seek for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while are reluctant to make concession for the global environment problem. According to Kenneth Waltz, he describes the anarchy as a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or a “permissive” cause of war. Although the environment issue is not a war-like element nowadays, it is the key of surviving for all men. Some people regard the Copenhagen Summit as the last chance of human beings saving themselves, through which we can se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complexity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However, what I want to point out is the way that did not work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can work in the scale of this municipality. The state of Tianjin is not anarchy, there is a puissant government controlling the main part of the resource. And it is convincing in theory that all the industries related with environment can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For those air-polluting industries, the government can resort to the pollution tax, which makes the factories pay more cost for their waste gas emission. And the supervision of emission should be stricter, especially for those air-polluting industries. The running of the conference can be much easier than the Copenhagen, because all the stuffs can be managed in Tianjin and we can raise the frequency of the conference. Then, after the meeting, the reports of the conference should be known to the public through the multimedia guaranteeing the transparency. The transparency and the frequency are the main differences comparing with some conferences we have already had. And through this way we have already reached some achievements. Tianjin set up China’s first comprehensive platform “Tianjin Climate Exchange” on September 25, 2008 for trading carbon credits under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will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y means of market and financial measures.^① This combined the advantages of finance and technology of Tianjin, and it could stimulate the undertaking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 exchange to gradually cover the whole countries and establish a fair and mature market of environmental exchange.

The wish for better air condition of Tianjin is filled with sincerity. We hope that every effort we make now can lead to a big change to Tianjin, to China, and to the world.

[整理：王 燕、李志宇]

[责任编辑：彭紫嫣]

[校对编辑：石 宇]

^① Tianjin Climate Exchange,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anjin_Climate_Exchange (最后访问时间：2014 年 6 月 18 日).

【编者按】又是一年毕业季,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迎来了大学生涯最不舍的时刻。难忘岁月峥嵘而前路漫漫,本期毕业特辑既有学长学姐们的经验分享,也有他们对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的感言和恩师的寄语,最后我们统计了毕业生的去向,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经验分享】

关于保研的那点事儿

姚丽丽*

保研的同学总是被周围人欣羡不已,但他们其实也下了不少功夫,更有许多的迷茫与纠结。由于之前我对于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摇摆不定,所以这里要说的关于保研的一些事大多都是我本人的前车之鉴,也有些是周围保研达人们分享的,在此也就借花献佛啦。

具体而言,有志绕过考研独木桥继续求学之路的伙伴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保证较高的学分绩,不轻易满足,孜孜不倦地追求更高。平时多跟着老师做一些项目,有能力的话尝试发表1至2篇论文,积淀专业素养,遗憾的是笔者没有做到。即使没有这样的机会,学校的百项是一定要参加的,这是在本科期间学习如何关于某一对象开展项目研究的大好机会。还有就是学院每年的五四论文也应积极参加,这不仅是倒逼着自己多练笔头,也是积累加分的亮点哦。其实,大三暑假不仅对于考研同学是至关重要的时光,对于有希望保研的同学也是如此。看似闲暇的暑假有好多事可以干,比如看些专业书力图对于本专业内容有一个大致回顾,这既是为保研面试做准备也是为之后读研打基础,或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申请外校夏令营,尤其是亲睐于外推的伙伴们,若是在暑假能获得一个提前录取名额,就打赢一半的胜仗了。而至于对南开恋恋不舍依旧想留下的,就看个人喜好了。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学术外推、学术内推、专硕外推的风险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学术内推是相对保险的,讲求保险的同学大多倾向于内推。而至于学术外推,当然一般是向往北大清华、复旦上交等,所以一般是学分绩排名与综合排名都在前三的同学尝试,其成功几率才较大,而稍微靠后的同学则更需考虑风险成本;至于专硕外推,就2014年的情况而言,较为乐观,大多就读的是法律专硕。不过,伙伴们前去笔试与面试前,临时抱佛脚,恶补一下法律和逻辑知识也是必要的。还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保本校外专业的,这一般见于双修同学,而且是两个专业的学分绩排名都十分靠前才有可能,需要强大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效率,成功者称为学霸真乃实至名归。

至于保研面试。学分绩靠三年的日积月累,重在平时表现,相对而言,保研面试则是看短短几分钟的临场发挥,因此,能不能获得免试读研的入场券,面试虽仅占30%,但不容忽视,应从容应对。总体而言,需要注意细节,自信大方、谦虚有礼,回答问题实事求是以及逻辑清晰、言之有理。具体问题主要包括专业性问题、与递交材料相关的问题以及其他一般性问题等。还有就是国际关系系的面试有时会有英语提问,因此在大三下暑假多温习英语

* 姚丽丽,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4届本科毕业生。

尤其是英语口语也算未雨绸缪啦。而且到了研究生阶段,课程都需要阅读大量英文文献,提前加强英语练习也是为长远做准备。

说了这么多经验,作为后知后觉者的我大多都没有做到,实乃汗颜。在此真心愿学弟学妹们不要步我之后尘,为读研早作准备。最后,想说的是,读研还是要靠扎实的学习和平时的积累,虽然上述分享了一些关于保研的具体准备技巧,但这只是为伙伴们的保研之路锦上添花,断不可舍本逐末。

工作经验分享

郝敬伊*

一直想要给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下找工作的经验,但苦于琐事缠身一直没有时间静心去写一篇文章,临近毕业自觉不管多忙也应该给尚在学校的盆友们留一点福利,希望这篇感悟能够帮助学弟学妹们在求职的道路上少走些弯路。

先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 2010 级政治学与行政专业的学生,从去年 9 月到今年 2 月份一直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了 4 家公司的 offer,最后选择去三星电子做 HR。

早在去年 8 月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的我认为工作不是那么难找,可是等到 9 月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一起面试的童鞋们一个比一个出色,一个比一个能说,有南开经管专业的、北大清华的、海归硕等等(当然看到这里同学们也不要灰心,做好充足的准备也可以完胜那些大牛们)。那时我才发现自己看上去蛮丰富的经历一经比较就显得黯淡无光了,有了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于是开始对自己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定位,有目的有方向地进行职位申请。我想给大家的建议是:清醒的自我认识会帮助你找到合适的岗位。基本上所有的求职攻略都在说一件事:工作岗位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无论你以后是就业还是读研究生,最好找时间提前做一下职业规划,结合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仔细分析一下自己究竟想干什么。因为就职业规划来讲,当你在网申或者面试的时候 HR 很有可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进一步来讲这可能影响你整个人生职业发展道路。

要说找工作的最大感受就是成长了,因为找工作是一件十分考验人耐心和毅力的事情。从网申、笔试到一面二面,所有的细节都需要严格把控,稍微马虎一点就会满盘皆输。举个例子,我曾经申请过百威的管培生,因为要输入全英文信息,申请速度会慢一些,但奇怪的是我提交了 N 次都没有发送到对方的简历库。后来我才发现少了个标点符号,等到修改好了也到了截止日期,错失了一个不错的机会。

怎么做简历、如何去面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前人叙述的已经很详细了,应届生求职网上也有很多的攻略和帖子,推荐大家去看看,里面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多优质帖。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杜拉拉升职记的影响,我十分向往去外企做 HR,于是就申请了一系列外企的人力资源管理岗。如今我才发现这是申请难度系数最高的职位之一,许多企业会更倾向于招聘

* 郝敬伊,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2014 届本科毕业生。

销岗，但人力资源岗每年最多要 1-2 个，僧多粥少，竞争激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建议大家提前做好定位和计划，海投固然可以增加投中率，但更多的是会消耗时间和本就不多的自信心。下面我主要说说面试玛氏（做德芙巧克力的）综合管培生的一段经历：

流程：网申——笔试——无领导小组——青年论坛——OFFER

1. 网申

玛氏的网申还是比较有特色的，职能类的岗位需要 3 人组队，各自申请并且合作一个产品改进案或者是策划案，最后 HR 会针对个人申请和集体策划案给每个人打分，决定进入笔试的名单。玛氏十分看重大型志愿者经历、校级以上奖学金以及是否有世界 500 强的实习经历，如果你有这些经历并且策划案做得很好的话，那恭喜你网申通过的概率就很高。

2. 笔试

笔试分为两个部分：数理逻辑和托业（听力、口语考试）。数理逻辑部分不会太难，可以参考历年题库。如果学弟学妹们考过托业且分数在 820 分以上可以免考英语。考过之后，会刷掉一半以上的人。

3. 无领导小组

学姐和多数人一样止步于此，这场面试的通过率是十分之一，考题是一道玛氏家经典案例。由于是全英文面试，大家开始都很紧张，到了后来才激烈的讨论起来，和我一组的同学都是北京各高校的硕士，作为本科生的我顿感压力巨大，发挥得不是很理想。

尽管失败了，但我觉得此次经历收获最大，认识了不少优秀的同学，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在以后的面试中不断积累经验，最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几个 OFFER。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如何表现自己的特色、怎样写求职 Email 等等，但由于字数限制，就先给大家推荐一下找工作最基础的事情，如何全方位获得招聘信息？

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1. 本校的就业信息网。上面有大量的招聘信息，除此之外我还推荐去隔壁天大网站上多看看，有很多企业会在天大南开之间选一个进行宣讲，所以为了有更多的选择性，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

2. BBS 是比较靠谱的，上面会有公司直接会把信息发在就业版块上，除了就业信息还有不少实习信息，大二大三的童鞋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3. 应届生、泰达人才网、智联招聘：这几个网站很好，主要推荐应届生求职网，上面有全面的招聘信息。

4. 个人人脉关系：多多和直系学长学姐或者是老乡沟通，也许他们会有一些机会提供给你。记得一位就业指导老师曾经说过：“等到了真正找工作的时候就得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才能找一个自己称心如意的职位。”这句话直到我经历无数次碰壁之后才意识到其深刻之处。所以也希望学弟学妹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有没有身边有这样的资源。

说得差不多了，另外建议找工作的筒子们配备一辆好骑的自行车，有时候一天要在南开

天大往返跑四、五场宣讲会，如果仅靠 11 路公交车的话是十分浪费时间和精力。

其实精英们找工作并不难，但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就不得而知了。找工作就像找合适的配偶一样，寻寻觅觅，得通过比对沟通之后才会发现自己适合哪一款。但其过程本身就是痛并快乐着的，经历过之后会有一种凤凰涅槃之感。

同时希望学弟学妹们一定要保持自信心，求职过程中肯定会受到挫折和打击，但一定要增强恢复自信的能力。就像我压力大的时候只能将身边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填到肚子里才能感觉安心，有时晚上会失落和彷徨，但经常是睡一觉到早晨蹬上高跟儿鞋，继续去跑宣讲会、参加面试。

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在求职道路上一帆风顺！

留学申请碎碎念

曹滢*

毕业在即，收到系刊分享留学申请经验的邀约，捋捋思路，却发现心头纵有千言万语要交代，真要落笔竟不知从哪里说起。想起四年前的我第一次翻看新视界，读到的经验分享文章都署着不甚熟悉的名字，但依旧能记得当时心头对前辈们的仰慕，也意识到此刻我写下的文字必须是负有责任的。回顾了一下，四年来《新视界》刊登了许多关于分享留学申请经验的文章，既有谈本专业申请的，也有备考标准化考试的，有心的同学可以翻来看一看。

出国留学或许是许多人的梦想，一如大一时候的我，但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的形象是模糊而抽象的，只是我会对留学申请有关的信息多一份留意。我从学姐学长那里得知，取得和保持“拿得出手”的学分绩的重要性，所以大学四年来，我认真对待学习和考试，以至于在申请阶段基本不需要为 GPA 担心。各研究生院会设置 GPA 最低分数线，一般为 3.0，但本人认为，如果你能保持 3.5 以上甚至更高的学分绩，就不用为 GPA 这事忧虑了。而事实上，GPA 不仅是留学申请的第一道门槛，同时也是保研、评优等其他机会的敲门砖，所以无论你学生活动有多忙，履行好一个学生的基本义务总是有益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曾辅修过一学期的经济类课程，虽然没有从一而终，但在实际申请过程中，这一学期的课程还是很有用处的，因为有些项目需要经济学基础，这样我起码不需要临时“补救”了。以此类推，建议大家提前查好预申请学校的要求，及时补充相关专业方向的相关背景。当然，除了学习以外，我也会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能丰富你的校园生活，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同时也能为你的简历增光添彩。

大二下学期和大三上学期，我分别报了托福和 GRE 的培训班，开始准备标准化考试。回望我的备考过程，我的英语基础还算不错，但备考过程并不轻松，反思一下，主要是“敌强我弱，盲目轻敌”：在托福方面主要是练习太少，阅读和听力是我的强项暂且不谈，而口语和写作完全就是“体力活儿”，完全靠练习，所以这两个单项，尤其是写作，在我加强练

* 曹滢，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4 届本科毕业生。

习后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而 GRE 的关键还是老生常谈的单词问题,在勤背单词的基础上,把权威练习材料都保质保量地过一遍,问题就不大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会更加努力地克服拖延症,更早更及时地搞定 GT。只有那样,才能在正式申请阶段做到有条不紊,步步为营。当然,100 分以上的托福考试是留学申请必过的“无忧”分数线,而 GRE 考试有些项目是不要求的,大家可以根据学校的要求来决定是否报考。

大三下学期,我找了留学中介,希望能够得到择校和文书准备上的帮助。但这也是我整个留学申请过程中最“惨痛”的回忆。根据多方比较,我选择了北京的一家小型中介公司,因为当时的我认为,相比与大公司的流水线操作,小公司更可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但结果是,留学中介取得成功案例的因素太多了,可能是学生本身比较优秀,也可能是录取的学校排名较为靠后,但归根结底,每个人的水平不同,对中介服务的满意程度就会迥然不同。我获得的备选学校名单总有排名差到不靠谱的学校,拿到的文书也是“惨不忍睹”,唯一让中介去做的网申,错误也是屡见不鲜。结果就是,我比 DIY 的同学多付了上万的中介费,却要中介额外多操一份心外加分分钟想要打官司维权的冲动。因此,个人比较建议本身英语基础尚佳的同学不要找中介,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与那些中介公司的“老师们”相比,唯有你最能为自己的梦想负责。中介能提供的学校信息、录取要求和网申服务等等,自己勤快点查查学校的官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 DIY 小组多商量讨论一下,再请教下学长学姐,完全可以省下中介费用来缴纳学校的申请费。当然,我也并不反对大家去找“靠谱”的中介公司和老师,毕竟有专业的指导意见是极其重要的,但做任何事都要本着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不要人云亦云,放弃独立思考与承担意识和能力。

基本上大三暑假学校基本选定,文书也应该有了基本的准备,9 月到 12 月,美国各个学校会继续陆续开放网申系统,按照学校要求,准备文书,递送成绩单、GT 成绩和财力证明等材料即可。我申请的学校较多,但文书还是坚持根据每个学校的特质和项目方向做了相应的修改与调整,比如有的项目比较看重数据处理能力,那么我就会简历或个人陈述中突出展示我上过的相关课程和参与过的研究项目。通过相匹配的文书,我们可以向招生委员会展示我们对项目的深度理解和研究方向的专业思考。而学生与项目的“匹配(match)”有时候甚至比这个学生是否极度优秀更重要。

2014 年的 1 月 15 日,我的申请工作基本结束,2 月 1 日,我收到了我的第一封录取信,也开启了我喜忧参半的等待过程。那段邮件推送声一响,就会从梦里惊醒的日子,每一天都有满满的期待。总而言之,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自费硕士的申请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备考或申请过程中,觉得人生晦暗无光时,请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你会云淡风轻地跟别人讲你这一路的喜怒哀乐,人生还在继续。

【大师寄语】**How to Get a B.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5 Minutes^{*}**

Stephen M. Walt

It's late spring here in New England, which means it is also commencement time for the latest round of graduates from the region's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proud parents and relieved graduates are busy celebrating, I worry that many of them are secretly filled with regret. Why? Obviously, because many of them didn't take enough cours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uter science, Biology, Economics, Applied Mathematics, 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re all fine subjects, and History, English Literature, or Sociology can be fascinating, but how much will any of these subjects teach you about the intricacies of world affairs, globalizatio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eally cool stuff that people like me get to study?

Never fear: I have a solution. A few decades ago, Saturday Night Live's Father Guido Sarducci (a.k.a. Don Novello) created the concept of the "Five Minute University." It was brilliantly simple: in five minutes he promised to teach you everything you'd actually remember five years after you graduated. For example: Economics? Easy: "supply and demand." That's it. Theology? "God Loves You." And so forth.

So if you're ruining the day that you got a finance degree and didn't take any courses that were actually interesting, I offer here the Five Minute University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consists of five basic concepts that teach you all you really need to know about the fascinating world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less you are a very slow reader, this shouldn't take more than five minutes.

No. 1: Anarchy

You don't have to be a realist to recognize that what mak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ifferent from domestic politics is that it takes place in the absence of central authority. There's no cop on the beat, no authoritative judge or courts to which states can appeal, and no 9-1-1 to call if you get into trouble. (Just ask the Ukrainians, Lebanese, or Rwandans about this little problem). In the absence of a central authority that can protect states from each other, major powers have to provide security for themselves and remain on the lookout for trouble down the road. This situation doesn't preclude cooperation or even occasional minor acts of altruism, but it means security is usually at a premium and fear casts a long shadow over the entirety of world affairs. Anarchy may be "what states make of it," but mostly what they make of it is trouble.

No. 2: The Balance of Power (or for extra credit, the balance of threats)

^{*} Stephen M. Walt, "How to Get a B.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5 Minutes," *Foreign Policy*, May 19, 2014. Stephen M. Walt is the Robert and Renée Belf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Harvard University.

Given anarchy (see above), states worry about who is stronger, who is catching up or falling behind, and what steps can each take to avoid permanent inferiority. The balance of power tells you a lot about how states identify potential allies, and whether war is becoming more or less likely. Big shift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are usually dangerous, either because rising powers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 or lagging powers launch preventive wars, or simply because shifts make it hard to know who is presently stronger and thus make miscalculation more likely. Although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e term has been debated for a long time, trying to understand IR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balance of power is like trying to play baseball without a bat, or play the blues without a backbeat.

No. 3: Comparative Advantage (a.k.a. "gains from trade")

If you never took a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n you need to grasp the basic no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which underlies the entire liberal theory of free trade. The idea is simple: states will be better off if they all specialize in producing items in which they have some relative advantage, and then exchange these goods with the good produced by others whose relative advantage lies in producing something else. Even if one country was superior at producing all goods (i.e., had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everything), everyone would still be better off if they produced the good(s) where their relative efficiency was greatest. The logic of this argument is irrefutable, but it took a couple of centuries for it to become widely accepted. The (partial) rejection of mercantilism and the embrace of more open trade is the root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and a key reason why the world is more prosperous today than it was two centuries ago,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vast and remarkable web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if you don't grasp this basic reality.

No. 4: Misperception and Miscalculation

A wise friend of mine likes to say that mos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n be summed up in three words: fear, greed, and stupidity. We've already covered the first two (anarch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re about fear, and free trade is about the benevolent effects of greed). But the third one -- stupidity -- is equally important: you can't really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ithout recognizing that national leaders (and sometimes whole countries) frequently mis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often do remarkably stupid things. One country feels threatened and reacts defensively, leading other countries to falsely conclude that it has vast and dangerous ambitions that must be countered. Sometimes it works the other way, however, and a relentless aggressor manages to fool others into believing that its aims are limited. Or states tell themselves self-serving, sanitized narratives about the past -- one where they never did anything bad to anyone and their opponents are always at fault -- and then they get surprised when other

states don't see the historical record in the same way.

Any qualified IR graduate also needs to know that national leaders often do dumb things, even when surrounded by hordes of well-trained advisors and backed up by vast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Why? Because information is imperfect, other states sometimes bluff or lie, and because bureaucrats and policy advisors are subject to the usual human foibles (including cowardice, careerism, and imperfect rationality). You won't remember all these details five years from now, but keep this lesson firmly in mind: the people in charge usually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No. 5: Social Construction

I'm not a constructivist, but even I acknowledge that the interactions of states and other human institutions are often shaped by changing norms and identities, and that these norms and identities are themselves neither divinely ordained nor fixed.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themselves the product of human interaction: what we do on a daily basis but also how we talk or write and how our ideas and beliefs evolve over time. One cannot understand nationalism, the end of slavery, the laws of war, the rise and collapse of Marxism-Leninism,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gay marriage, and a host of other important global phenomena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at social reality is not like the physical world; it is made and remade by what humans do and say and think. Although we can't predict how attitudes, norms, identities, and beliefs will evolve, being aware of this aspect of world society will keep you from being completely blindsided when seemingly unchallenged orthodoxies are suddenly swept away.

This concludes the Five Minute University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re's a lot more to say about this whole subject, but I'm afraid our time is up. If you understand these five concepts well, you now know what most IR undergraduates will remember five years after receiving their diploma, unless they end up doing this sort of work for a living.

To be clear: I'm not suggesting that these five concepts exhaust the whole of the field. To be a real expert, you'd need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deterrence and coercion, institutions, selection effects,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a number of other key ideas. A good work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would surely help as well, plus a lot of detailed expertise in specific policy areas.

But acquiring this level of knowledge means you'd have to think seriously about graduate training, and that would take at least another five minutes. In any case, if you (or your child) are a member of the Class of 2014, please accept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And if you did get an IR degree and plan to work in this field, don't worry: my generation has left you plenty of thorny problems on which to work -- and you can hardly do worse than we did.

【毕业感言】

大三时总是纳闷大四的人都去哪儿了,到了大四却早已慢慢习惯空荡荡的楼道,行李箱拖动的声音,伴着来去匆匆的脚步,时不时打破往常的安静,或是一场短暂离别的愁绪,或是一次突然聚首的欣喜。到了毕业之际,继续留在南开读研的我,终将送走一位位同窗好友,道一声珍重,但明白今夏之别后的重逢已是遥遥无期。待到9月,独自走在大中路上、马蹄湖畔,回忆四年来10国政的点点滴滴,或是别番滋味。

——2010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姚丽丽

南开四年,转瞬即逝。

临近六月才越发感受到毕业的气息,开始论文答辩,开始拍毕业照,开始毕业旅行,只有到这时候才惊觉这已经是我在南开的最后时光。回顾四年也许会怀恋初入南开时的单纯质朴;但也更感谢这四年来带给我的成长,带给我的真挚的友谊,广阔的知识 and 鲜活的经历。

我们的南开园也许没有大气磅礴的气势,而我也恰恰倾心于它的小家碧玉。临别之时才越发感受到对南开的不舍,走过无数次的大中路,经历变迁又最终繁华的西南村,每天纠结吃什么的食堂,还有夕阳下的操场,20宿门口的花坛,每一处景象都让人难忘。如果将南开比作一种花,她不会是妩媚娇艳的玫瑰或是雍容华贵的牡丹,我愿将她比作纯白的栀子花,纯洁、淡然、清幽,淡淡的花香让人久久难忘。

南开之于我,已经是另一个充满归属感的地方。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任何时候提起南开我都会微笑着告诉大家,那是我的母校,我爱她!

——2010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贺莉莉

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四的学生来说,感慨良多。回顾四年来的大学生活,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是也有很多收获。这四年来最大的收获或者说教训就是——找到目标,做好规划。只有找到目标才能给自己足够的动力和激情,做好规划才能让自己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不会迷茫。同时很感谢,四年来老师和同学对于我的关怀和帮助。这四年的时光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最美好的四年。

对于仍然在南开读研的我,未来的学习也是一座艰难攀登的高峰,但是正如我说的,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并且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完成自己的目标。两年之后我就可以不留遗憾地离开南开,让自己日后的表现不辱南开威名。

——2010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杨雪

也许就在1个月前,大家还在为毕业论文的事情忙碌着,像共赴最后一役的战士,互帮互助,肝胆相照,通宵达旦地奋战论文的感觉颇有些豪迈之气。而此时此刻,答辩阶段也过去得差不多了。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些场景,应该会笑着还念吧。我总自嘲说,四年读得最多的专业书应该就是大一刚入学买的那本《国际关系精要》了,每次遇到概念问题,都要拿出来翻一翻。而如今再次翻开这本书,每一字每一句似乎都能触发一些回忆:那些上过的专业课程,那些做过的课堂展示,那些扮过的政坛人物……原来在这一生中最耀眼的年纪里,我们学着国际关系相互陪伴着走过了如此单纯而美好的四年光阴。感谢我的老师们,这师生情谊我将一辈子记在心上;感谢我的小伙伴们,相识相知相伴,即便此后海角天涯,曾经聚

首南开的我们都会是幸福的~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曹 滢

大学四年，经历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要说感慨的话，就一句话：“能遇到各位，真的是太好了！”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吕 海

近期一大波的毕业事宜袭来，身边朋友的校外生活方向也大都确定，或继续深造，或开始工作，返校交流之时才明白校园的可贵与学习的不足，而四年所收获的友谊仿佛就是我们最为可贵的收获之一。论文答辩、毕业合影、毕业旅行、毕业晚会、毕业典礼，当经历完的事物之后，我们也将告别四年的好友迎接新的生活。坦然面对，依旧前行！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庞 强

【恩师寄语】

敬业修德闯四方，展公施能写青春，担责天下肩大任，日新月异谱华章！

——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国际关系系教授）

祝贺同学们迈上人生舞台的一个新台阶。在新的阶段，你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面临的任務也将更为棘手，每一步都会是一种考验。

然而这却是一片更为广阔和自由的空间，你的才能和抱负都有可能得到更好的释放。愿你们把握自己的机会，走出一生最为灿烂的时段。

——杨 雷（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毕业是一个新的起点。希望即将进入社会的同学以及继续学习深造的同学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祝大家鹏程万里！

——刘兴华（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国际关系系 2014 届部分毕业生毕业去向

姓名	年级	毕业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毕业去向
袁伟华	2010 级博	权力转移、国家意志与国际体系变迁	韩召颖	天津工业大学
陈一一	2012 级硕	领土争端为何反复爆发？	吴志成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毛 伟	2012 级硕	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与网络安全	吴志成	中国人寿
王泽璞	2012 级硕	全球经济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吴志成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杨蛟龙	2012 级硕	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在美国大型并购行为的审查	张睿壮	山东电信
李家胜	2012 级硕	印度海洋战略：效果评估与成功因素	赵龙跃	江苏省连云港 市委机关
刘 明	2012 级硕	浅析新世纪以来的拉美资源民族主义	王翠文	酒仙网
迟 永	2012 级硕	美国在领土争端中的军事干涉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刘 丰	南开大学读博
王 燕	2010 级本	全球治理的时代特点 及其对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的要求	吴志成	南开大学读研

张晓康	2010 级本	中国复兴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	吴志成	香港中文大学
谷天一	2010 级本	经济危机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原因探析	赵龙跃	宾州州立大学
王芳琳	2010 级本	美国的两洋贸易战略解析 ——TPP 与 TTIP 背景下中国的应对策略分析	赵龙跃	北京大学读研
张力文	2010 级本	浅析非洲新“圈地运动”背后的国家博弈	徐振伟	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
曹滢	2010 级本	美国对外武力干涉的决定因素	刘丰	哥伦比亚大学
刘志	2010 级本	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 主要维度，判断标准与实现路径	刘丰	南开大学读研
吕海	2010 级本	美国海外反恐军事干涉行动的动因分析	刘丰	卡内基梅隆 大学
杨雪	2010 级本	浅析国际规范的传播与内化 ——世界人权规范对中国人权发展的影响	刘丰	南开大学读研 (格拉斯哥项目)
郝丽君	2010 级本	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与非洲中资企业 社会责任的履行	刘兴华	伦敦大学学院
刘雨晨	2010 级本	干涉能否有效树立国际威信？ 基于美国案例的分析	刘兴华	伦敦大学学院
姚丽丽	2010 级本	网络安全规范领域的竞争与合作 ——以中美两国为例	刘兴华	南开大学读研
贺莉莉	2010 级本	简析南亚“女性领导人”现象	霍特	厦门大学读研
张茜	2010 级本	美国大战略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	霍特	南开大学读研 (格拉斯哥项目)
李梦奇	2010 级本	国际货币交换协议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阎梁	广州市例外 服饰有限公司
孙晶	2010 级本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分析	阎梁	山东省潍坊市 国税局
刘葭菲	2010 级本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军事活动变化	黄海涛	工商银行
姚顺平	2010 级本	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美日同盟新变化 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黄海涛	平安保险
鹿强	2010 级本	INGO 与 IGO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 ——以绿色和平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例	杨娜	南开大学 研究生支教团
肖文强	2010 级本	美元霸权的运作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威胁	杨娜	南开大学读研
赵政	2010 级本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与实践	杨娜	天津市地税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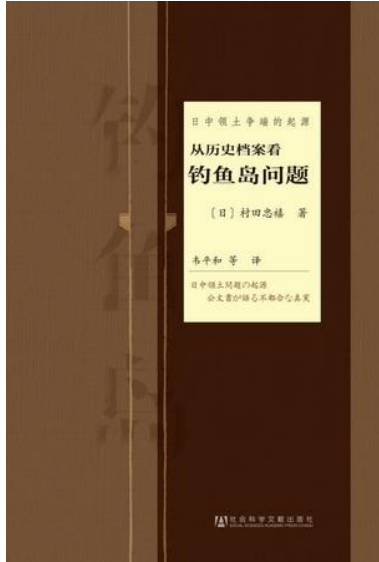
[整理：姚丽丽、陈一一、马焜粮、郝丽君、高振华]

[责任编辑：程康]

[校对编辑：孙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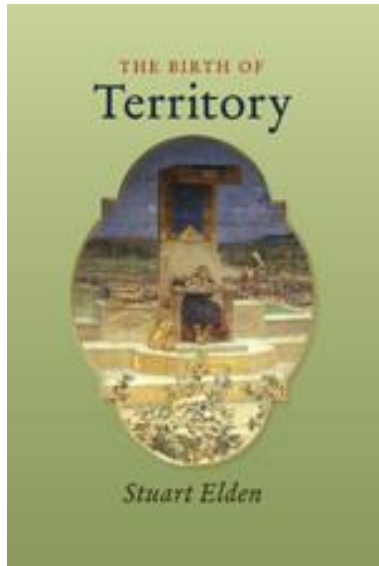
新书架(二)

【编者按】领土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一大焦点,近年来关于领土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升温,世界各地的政治问题也或多或少都与各国领土问题有着一定的联系。本期新书架筛选了近年来部分有关领土问题的著作,包括对部分地区领土问题的研究、领土本身的讨论等,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关于领土问题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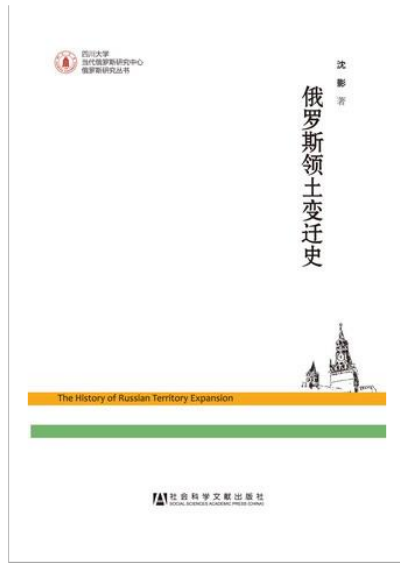
[日]村田忠禧:《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中日历史问题译丛)》(韦平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本书首先介绍了琉球国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到部分岛屿被萨摩藩支配再到被纳入日本的藩幕体制的过程,并利用各个时期的地图,从地理的角度说明钓鱼岛不属于琉球3府36岛的理由。书中作者指出了下述情况:中日两国均主张岛屿是本国固有的领土,但根据不同,日本方面的根据充其量不过是从1895年2月开始,而中国方面的主张如果从1403年明代《顺风相送》的记载算起,比日本早了600年以上,历史时间跨度是日本5倍以上,随后作者进一步引用当时册封使的航海记录,说明钓鱼岛不属于琉球国的理由。本书的一大特点便是,作者将钓鱼岛的论述放在琉球、中国、日本之关系的大背景下,让读者更全面、清晰地了解钓鱼岛问题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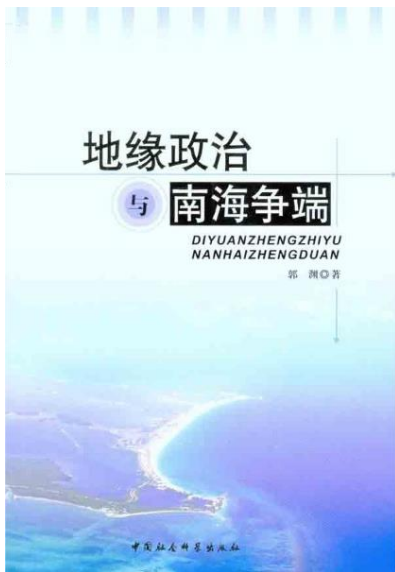
斯图尔特·埃尔登:《领土的诞生》,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年。(Stuart Elden, *The Birth of Terri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领土是一个现代世界的核心政治理念。事实上,领土在世界划分和政治控制中行驶重要职责。然而,与其他重要概念,如主权、权利和正义等相比,领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领土仍然起着重要政治作用,并且领土争端和管理得到了系统的研究,但在今天,领土这一概念本身却仍然总是被忽视。地球表面的一部分的专属所有权的想法从何而来?在这种表面上简明直白的定义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复杂含义?本书提出了西方该政治思想中领土概念出现的详细清单。纵观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早期现代思想,作者检索了领土这一概念从古代希腊到十七世纪的演变,以分析当代对领土的理解形成过程。埃尔登列举了一系列历史、政治、文学作品和实践,以及一些关键人物,如一些历史学家,诗人,哲学家,神学家,和世俗政治理论家等,以揭示世界组成的形式和地球表面的领土是如何被划分、控制和管理的。



沈影：《俄罗斯领土变迁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领土是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国家各种要素的载体，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所以，研究一个国家必须研究它的领土，而研究俄罗斯的领土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是系统研究俄罗斯领土变迁历史的专著。本书在回顾沙皇俄国领土扩张历史的同时，重点分析了苏联领土和疆界的变迁。提示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变化和面临的新边界形势，这是本书的另一个重点。作者在研究俄罗斯领土变迁历史的基础上，还就解决当今国家间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郭渊：《地缘政治与南海争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本书根据南海地缘政治环境、格局、秩序的分析框架，首先阐述了地缘政治理论的演变过程、主要内容及其思维取向，这为以后各章的深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根据地缘政治环境的有关原理，分析了南海地缘政治环境现况及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并透析影响南海地缘环境的地缘因素。再次叙述南海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以及历代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剖析周边国家、东盟的南海地缘战略及未来走势；深入分析美国的南海政策及其限制性因素，以及日本和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演变过程与特征、制约因素，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复次对南海地缘政治秩序进行探讨，叙述其变迁过程，阐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的国内法及对南海权益的维护，描述、评析周边各国所制定或通过的国内法或政令等有关内容。

[整理：缴懿鑫、李基凯]

[责任编辑：李璇]

[校对编辑：郝丽君]

♣学术交流♣

康奈尔大学米勒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

(转自政府学院网站新闻)4月14日,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为南开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防止中美新冷战噩梦”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睿壮教授主持,政府学院部分师生参加。

米勒教授首先从军事和经济等角度概述了现阶段的中美关系。他指出虽然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在短期之内也不会对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直接构成威胁,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新冷战仍然是可能发生的一种结果,因此采取预防措施以避



免这种危险是十分必要的。米勒教授随后从中美两国分别出发,从外交决策者、普通民众以及利益三个维度剖析了可能造成中美新冷战的原因。在他看来,可能造成中美冷战危机的原因,从美国的角度而言,便是美国外交决策者保持霸权地位的承诺、民众对保持霸权的普遍愿望以及金融利益、自然资源和美國想要维系一个支持自己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对全球影响力有所追求,在领土、自然资源以及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上会有自己的政策立场。最后,米勒教授指出,减少中美新冷战危险的发生,依赖于决策者以及两国人民,他从外交战略、道德以及国内政治的角度阐述了减少危机的方法。

在互动环节,米勒教授与在场师生就亚太地区的中美关系、霸权转移与大国关系、中国政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而热烈的讨论。

陈志瑞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

(通讯员:李金潼)2014年5月23日,中国国际关系知名期刊《外交评论》执行主编陈志瑞受聘为全球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并做客“周恩来论坛”,论坛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韩召颖教授主持,政府学院部分师生参加。

陈志瑞教授围绕“中国文化的姿态及其转向”做主题报告。他从个人的成长、求学及工作经历引入,阐述中国文化对中国公民个体发展的影响。接着,他对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

文化保守主义阶段与英国埃德蒙·柏克所处时代的文化保守主义阶段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二者在性质和内涵上都具有不同的特点。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姿态更倾向于一种“文化国际主义”,这对中国融入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互动环节,陈志瑞教授就国际关系研究的世界主义情怀、中国社会的规则意识、文化保守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规则的张力、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等问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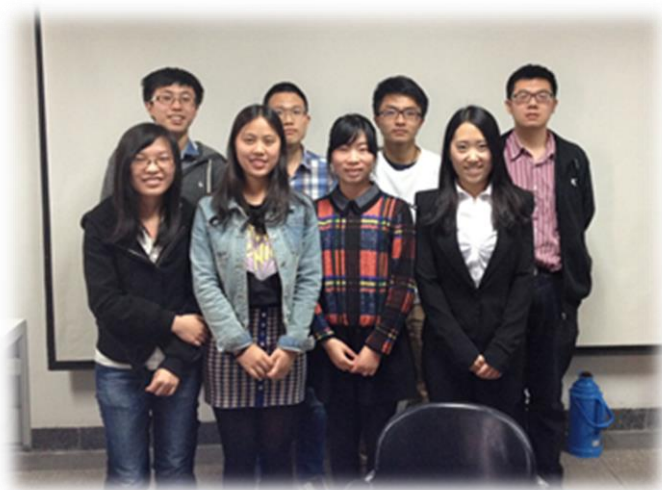
陈志瑞,外交学院《外交评论》执行主编、编审,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编辑部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执行主编。

♣师生活动♣

《新视界》编辑部春季内部培训会顺利举办

(通讯员:郭晓琼 摄影:庞强)3月30日下午,《新视界》编辑部在范孙楼440室举办了Microsoft Word 2010软件使用方法培训会。本刊主编吕海和副主编郭晓琼为在场同学详细讲解了该软件的使用技巧和方法。

会议开始,吕海讲解了Word 2010的字处理功能,对“文件”、“开始”、“插入”等全部8个菜单栏的功能一一作了详细的介绍。他重点讲解了一些编辑杂志时常常会使用到的功能,如编辑标记的开启、通过字体筛选进行文本内容替换、添加批注、修订模式的使用以及添加分节符和页眉页脚等。此外,在场同学也了解了一些Word使用过程的常用功能和技巧,包括如何更改作者名字、如何对文件加密以及如何设置文档字体的默认值等等。



随后,郭晓琼带领在场同学对具体一个栏目的格式以及如何对不同栏目设置每页不同的页眉进行了实际操作。通过交流和讨论,大家对这些技巧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和理解,表示学到了很多丰富的内容。

最后,姜忆楠等同学也与大家分享了在使用Word 2010的过程中一些心得与技巧。

会后,本次培训会的录音也上传至网上分享,以方便大家对Word软件各种功能进一步的记忆、理解和运用。

《新视界》编辑部成功进行换届选举

(通讯员: 郭晓琼 摄影: 刘 志、吕 海) 4月27日, 本刊编辑部在范孙楼 440 室举行了主编和副主编换届选举。2011 级本科生刘芮宁当选为新一任主编, 2010 级本科生刘志、2011 级本科生程康、于凯玥以及 2012 级本科生胡阳阳增选为新一任的副主编。



这次竞选一共有 9 名同学参加, 2 名同学竞选主编, 7 名同学竞选副主编。大家都进行了精彩的竞选演讲。他们提到, 系刊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平台, 在这里他们锻炼自己的同时也和不同年级的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上有很多交流, 这令他们收获了很多。此外, 竞选者们还提出了自己对未来工作的构想, 包括如何扩大《新视界》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本刊物, 使其成为大家沟通的桥梁, 以及如何在未来工作中避免栏目制作过程中的低级错误等等。

编辑部成员还对上一期春季号进行了挑错和总结, 发现了一些校对中没有发现的毛病和错误, 而且讨论了刊物存在的一些排版问题, 统一了《新视界》未来的一些排版要求。这是每次《新视界》在做完一期栏目之后的必经环节, 目的是为了不断总结经验, 以提高以后栏目的质量, 增加栏目的严谨性。

会议最后, 刚刚卸任的上一任主编吕海, 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他讲到自己成为主编之后, 制定了《新视界》的章程, 也增加了每次刊物完成之后的内部评分环节。尽管评分标准有些不合理之处, 但设立其初衷是为了调动各栏目责编制作栏目的积极性, 以后可以对此进行完善。此外, 他希望新任的主编及副主编们能考虑如何能让《新视界》兼顾学术性与交流性这个问题, 让刊

会议最后, 刚刚卸任的上一任主编吕海, 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他讲到自己成为主编之后, 制定了《新视界》的章程, 也增加了每次刊物完成之后的内部评分环节。尽管评分标准有些不合理之处, 但设立其初衷是为了调动各栏目责编制作栏目的积极性, 以后可以对此进行完善。此外, 他希望新任的主编及副主编们能考虑如何能让《新视界》兼顾学术性与交流性这个问题, 让刊



希望新任的主编及副主编们能考虑如何能让《新视界》兼顾学术性与交流性这个问题, 让刊

物发展得更好。

吕海还提到,《新视界》编辑部未来将与“政见”网站合作,将部分栏目的内容推送到网站上,这样可以扩大《新视界》的影响力,宣传刊物。同时毕业季即将来临,编辑部也将举行毕业生交流会,为低年级的同学与本届毕业生提供交流机会。

♣校外短讯♣

清华大学

●2014年3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新知论坛第18期在明斋315举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副教授 Kuik Cheng-Chwee (郭清水)老师带来了题为“*When and Why Weaker States Hedge: The Case of ASEAN States'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a*”的演讲。

复旦大学

●2014年4月8日下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院长 Peter F. Cowhey 教授一行访问复旦大学,演讲以“*The Lessons from New Innovation Models for China*”为题,分享了企业科技与制度创新的经验和创新模式的更迭。

中国人民大学

●2014年4月10日上午,波兰驻华大使塔德乌什·霍米茨基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并发表演讲,房乐宪教授、崔守军副教授、Manuel Perez Garcia 博士、朱凤余老师等参加会见。会见后,塔德乌什·霍米茨基大使做了题为“*中波关系:现状与未来*”的讲座。

外交学院

●2014年4月27日,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资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与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拉政

治、投资与文化关系”研讨会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举行。正在访华的拉美开发银行董事长恩里克·加西亚等4位拉美专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第一副理事长沈国放,以及来自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经济学院、外语系和国家开发银行的专家学者共约20余人与会。

北京大学

●2014年5月7日晚,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举办题为“*全球地区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中国 FTA 战略*”报告会。国家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张少刚先生担任主讲嘉宾,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亚洲研究院院长、中国委员会执行主任肖逸夫(Yves Tiberghien)教授担任点评嘉宾。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年5月12日下午,德国汉堡国防军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施塔克教授(Prof. Dr. Michael Staack)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了题为“*德国与欧盟*”的讲座。讲座围绕着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欧盟的国际地位、德国在欧盟中的作用、欧债危机的影响以及克里米亚危机等几个问题展开。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2014年5月中旬,第四届亚信会议领导人峰会将在上海举行。为了配合上海亚信

峰会举行, 4 月 7 日,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以及哈萨克斯坦驻上海总领事馆协助和支持下,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协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了《亚信会议与区域合作: 现状与前景》

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学术机构专家学者、亚信秘书处官员、驻沪领馆外交官员以及媒体记者约 30 余人出席了会议。

[整理: 程 康、于凯玥]

[责任编辑: 郭晓琼]

[校对编辑: 张晓康]

· · · · · 芝加哥大学 · · · · ·

芝加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是一所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私立大学, 是世界顶级大学之一。截至 2014 年, 芝加哥大学先后有 89 位校友、教师和科研人员曾获得诺贝尔奖, 其中现任教师中有 8 位诺贝尔奖得主, 60 位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虽然与哈佛、耶鲁等大学相比, 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大学, 但是芝加哥大学以开放的精神, 并结合美国社会的现实, 建构了独特而卓越的组织理念、研究理念和教学理念, 使其在较短的时间成为美国, 乃至世界的一流大学, 并被誉为“第一所美式大学”。

芝加哥大学的校训译成中文是“益智厚生”, 意思是“提升知识, 以充实人生”。芝大首创季制, 一学年分为四季, 全年无休的课程制度, 让学生可以自由的安排学习时间, 每分每秒都不被浪费。

芝加哥在 2014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 的大学排名中位于全美第五, 其中, 在 2013 年度“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研究生专业排名中,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排名全美第 3, 而在 2012 年的排名中公共政策分析专业排名全美第 4。同时, 芝加哥大学还有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罗伯特·佩普 (Robert Pape) 等知名国际关系学者, 也有赵鼎新这样的出色华人社会科学家。因此, 芝加哥大学对于有志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整理: 马焱粮、唐铭兴、姜忆楠、吕 海]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4年3月—2014年5月)

1. 黄海涛、韩召颖:《美国才是亚太海域主权争端的搅局者》,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8日第A07版。

内容摘要: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在海洋主权问题上的争端被一些国际媒体、官方、学者偏向性报道和解读,使中国俨然“坐实”了亚太海域主权争端“搅局者”的形象。然而,中国在处理海上领土争议上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立场是长期和明确的。美国才是亚太海域主权争端的搅局者。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实施“重返亚太”战略,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战略意图的不信任,这种防范心态也导致其在亚太海域领土争端问题上“压中国、挺盟友、拉偏架”,这不仅无助于地区稳定,还导致争端进一步复杂化和长期化。在事关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由于实力增长而变得更加强硬的问题。在具体争议的处理方式上,也从来不存在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先例。亚太区域的情况错综复杂,维护亚太区域安全稳定,中美两国都肩负着共同的重大责任,这既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挑战,也是中美合作的重要机遇。

关键词: 亚太海域; 领土主权争端; 中国; 美国

作者简介: 黄海涛,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分析、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等方面的研究;韩召颖,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

2. 董柞壮:《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

内容摘要: 有关联盟设计与联盟可靠性的既有研究并未充分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联盟的形成、管理、维持和瓦解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变化都反映出国家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考量,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成本与收益的核算、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和降低成本的努力。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对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对另外两个方面则关注较少。文章从联盟的两个功能类型——威慑与援助——角度出发,认为联盟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威慑对手与援助盟友。联盟机制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对于盟友主要是通过复杂的机制提高背叛成本,对于对手则是发出有代价的信号威慑其冒险行为。通过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国家设置更高水平的联盟机制的目的在于提高联盟的可靠性,但由于国家在联盟中的成本与收益以及降低成本的努力不同,因此,联盟机制的设置对联盟可靠性的影响是复杂且有条件的。

关键词: 联盟类型; 机制设置; 成本与收益; 联盟可靠性

作者简介:董柞壮,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3.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3 期。

内容摘要: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试图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的因素结合起来解释国家对外战略和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在过去十多年间,这一理论催生了大量具有明确理论自觉性和鲜明问题意识的经验研究成果。与第一代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的研究相比,第二代研究成果在理论上侧重于理论运用而非理论建构,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经验实证研究,尤其侧重通过对多个历史案例的比较以及单个案例内部的过程追踪对这一理论衍生的具体命题加以检验。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坚持以具体问题而非理论为导向的路径,围绕某种特定的对外战略和国家行为展开深入探讨,从而推进了外交政策研究的理论化水平。当然,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内部一致性、理论逻辑的严密性和研究方法的精密性等方面仍然存在局限。为了继续完善和改进这一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者需要在国内政治的核心变量上凝聚共识,同时在解释具体问题时完善因果分析的链条,从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跨层次理论。

关键词: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分析;层次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纲领

作者简介:陈志瑞,男,外交学院教授,《外交评论》执行主编;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东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4. 韩召颖、田光强:《奥巴马亚洲之行难解盟友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5 月 14 日第 B02 版。

内容摘要:在亚洲局势日益错综复杂,美国的亚洲盟友开始担忧美国承诺的可信度的背景下,4 月 23-29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相继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旨在宣示美国对盟友的坚定承诺,扫除盟友对美国承诺的疑虑。美国对盟友的承诺虽然言之凿凿,但是却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重重矛盾。首先,所谓兑现盟友承诺可能会适得其反。美国在对日菲表态保护盟国“领土主权”的同时,也表示在日菲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不持立场。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反映出美国军事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美国这种“左右逢源”的政策在领土争端问题激化的情形下,必然会遭遇到左右为难的困境。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会造成非本意的结果。其次,奥巴马言论未能讨好韩日,美国亚洲盟友之间的矛盾制约其亚太战略的实施。虽同为美国的盟友,日韩之间却存在着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难以回避的冲突。在访韩期间,奥巴马借“慰安妇”问题指责日本,这样做是对韩国的支持,也希望弥合日韩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奥巴马的言行并没有对日韩关系的改善起到多大作用。美国不得不面对内部纷争不断的亚洲同盟体系。再次,美国宣誓坚守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亚洲盟友的利益,与其亚洲盟友对美国的需求

并不一致。奥巴马重申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是一种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的策略。美国用所谓的安全承诺这一空话来套取亚洲盟友实实在在的战略协助。而当亚洲盟友需要美国践行其安全承诺时,美国则可以种种理由“便宜行事”。

关键词: 美国; 奥巴马; 亚太之行; 亚洲盟友

作者简介: 韩召颖,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田光强,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6 期

1. 苏长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思索》,第 4-22 页。
2. 周琪:《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第 23-44 页。
3. 刘宏松、钱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第 45-68 页。
4. 牛军:《“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第 69-92 页。
5. 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第 93-119 页。
6. 李滨、陈光:《跨国垄断资本与世界政治的新变化》,第 120-144 页。
7. 张昕、冯绍雷:《乌克兰危机的理论透视》,第 145-155 页。

《当代亚太》2014 年第 2 期

1. 王传剑:《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第 4-26 页。
2. 曹群:《中美防空识别区规则是否存在分歧》,第 27-53 页。
3. 林秦喜、时殷弘:《韩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重点突进、综合交易及其他》,第 54-65 页。
4. 王明国:《东亚地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评估与未来发展》,第 66-95 页。
5. 莫盛凯:《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第 96-117 页。
6. 王在亮、高英彤:《区域间主义: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以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为例》,第 118-151 页。

《国际观察》2014 年第 2 期

1. 俞正樑:《双轮驱动,全球拓展——2013 年中国新外交》,第 1-15 页。
2. 杨昊:《全球秩序:概念、内涵与模式》,第 16-29 页。
3. 张磊:《西方政治制度研究中的管制视角:研究路径与理论内涵》,第 30-43 页。
4. 钮菊生、季超:《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博弈论研究三十年》,第 44-55 页。
5. 储昭根:《浅议“棱镜门”背后的网络信息安全》,第 56-67 页。
6. 石家铸、于玲玲:《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中国维护海上安全对策》,第 68-79 页。

7. 郭培清、孙兴伟:《论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北极“保守”政策》,第 80-94 页。
8. 陈力:《南极治理机制的挑战与变革》,第 95-109 页。
9. 肖晞:《日本战略趋向与中国的应对》,第 110-120 页。
10. 李秀石:《试析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扩张——从“反海盗”到“保卫”两洋海上通道》,第 121-134 页。
11. 李蕊:《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与国际协调》,第 135-146 页。
12. 张弛:《权力博弈、制度设计与规范建构——日本加入 TPP 后中国应对的策略思考》,第 147-157 页。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

1. 常璐璐、陈志敏:《吸引力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第 1-16 页。
2. 边永民、陈刚:《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中国在国际河流利用中的义务》第 17-29 页。
3. 吴志成、袁婷:《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论析》,第 30-42 页。
4. 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第 43-65 页。
5. 邱静:《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第 66-82 页。
6. 吴怀中:《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国际舆论动员》,第 83-106 页。
7. 庞珣、何榘焜:《微观决策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官僚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外援政策》,第 107-135 页。
8. 周明:《地缘政治想象与获益动机——哈萨克斯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评估》,第 136-156 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3 期

1. 郑安光:《美国对华“灵活推回”战略评析》,第 1-8 页。
2. 李秉忠:《土耳其“宝贵孤独”外交及其走向》,第 9-16 页。
3. 戴永红、李红梅:《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发展趋势探析》,第 17-21 页。
4. 张骥:《比较视野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22-29 页。
5. 陈开敏:《中国智库国际化转型的困境与出路》,第 30-38 页。
6. 黄忠、唐小松:《中国“危机公共外交”:形势、问题与对策》,第 39-48 页。
7. 王海滨:《试析俄日关系“解冻”及其前景》,第 49-56 页。
8. 孙立鹏:《美联储 QE 退出风险、路径选择及其对华影响》,第 57-62 页。

《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2 期

1. 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第 1-10 页。
2. 阮宗泽:《中国需要构建怎样的周边》,第 11-26 页。

3. 宋均营、虞少华:《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再思考》,第27-40页。
4. 宋国友:《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机制协调与策略选择》,第41-52页。
5. 徐坚:《重新认识战略机遇期》,第53-67页。
6. 赵鸣文:《乌克兰政局突变原因及影响》,第68-78页。
7. 赵华胜:《后阿富汗战争时期的美国中亚外交展望》,第79-95页。
8. 张愿、胡德坤:《防止海上事件与中美海上军事互信机制建设》,第96-108页。
9. 闫世刚、刘曙光:《新能源安全观下的中国能源外交》,第109-117页。
10. 王金波:《国际贸易规则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第118-128页。
11. 李晓玉:《“竞争中立”规则的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第129-137页。
12. 曹群:《“亚信会议与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第128-142页。

《美国研究》2014年第1期

1. 李相:《美国对朝鲜粮食援助政策的演变与评估》,第9-25页。
2. 朴键一:《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第26-46页。
3. 汪晓风:《社交媒体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运用》,第47-62页。
4. 左希迎:《<1986年国防部改组法>与美国国防部改革》,第62-85页。
5. 陈静静:《美国应对常规外交问题的模式——以对冲绳问题的决策(1945-1969)为例》,第86-115页。
6. 龙菲:《“美国文化外交:历史、理论与现实”研讨会综述》,第116-117页。
7. 王欢:《“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第118-120页。
8. 刘尊、樊吉社:《“美国军控政策年度回顾与评估”研讨会综述》,第121-122页。

《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

1. 贾庆国:《秉持“只争朝夕”精神: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第10-19页。
2. 巴里·布赞、节大磊:《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第20-25页。
3. 郑永年:《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第36-48页。
4. 张小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第49-58页。
5. 韦明:《小国概念:争论与选择》,第59-83页。
6. 宋伟:《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对中国是否有利?》,第84-103页。
7. 李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的运用》,第104-124页。
8. 袁明:《“双城记”——2013年访问莫斯科和华盛顿随笔》,第125-145页。

《欧洲研究》2014年第1期

1. 张浚:《福利困境、“去民主化”和欧洲一体化:欧洲政治转型的路径》,第1-13页。
2. 孙彦红:《试析1970年代以来的欧洲经济转型——产业结构的视角》,第14-25页。

3. 胡琨:《战后欧洲货币制度的转型——兼议欧债危机产生的根源》,第 26-37 页。
4. 丁一凡、赵珂:《主权债务、融资能力与国家兴衰——应对全球债务格局之变》,第 38-52 页。
5. 赵怀普:《冷战后欧美在东亚的战略互动初探》,第 52-70 页。
6. 薛力、肖欢容:《冷战后欧盟的冲突干预:以亚洲为例》,第 71-84 页。
7. 宋天阳:《论欧洲人类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第 85-99 页。
8. 张永安、徐利成:《欧债危机对中国对欧出口的影响与路径分析》,第 100-116 页。
9. 胡建国:《美欧执行 WTO 裁决的比较分析——以国际法遵守为视角》,第 117-126 页。
10. 邢瑞磊:《比较视野下的欧盟政策制定与决策:理论与模式》,第 127-140 页。
11. 刘作奎:《匈牙利欧尔班总理演讲综述》,第 141-144 页。
12. 鞠维伟:《匈牙利驻华大使演讲综述》,第 145-147 页。
13. 王亮、韩一元:《“中欧关系中的误解”学术研讨会综述》,第 148-151 页。

《国际政治科学》2014 年第 2 期

1. 谢超:《印度核试验动机探析》,第 4-33 页。
2. 麻昌港、韦国善、张立:《中国—东盟关系定量研究》,第 34-51 页。
3. 苗中全:《建设国家军事能力的政府因素探究》,第 52-90 页。
4. 贺平:《贸易政治学的个体主义视角》,第 91-121 页。
5. 任娟:《联盟政治影响强制外交的效果——评〈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问题〉》,第 122-136 页。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2

1.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Gulotty, "America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Limit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pp. 263-295.
2. Stephen C. Nelson, "Playing Favorites: How Shared Beliefs Shape the IMF's Lending Decisions," pp. 297-328.
3. Susan D. Hyde and Nikolay Marinov, "Information and Self-Enforcing Democrac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Election Observation," pp. 329-359.
4. Stephen C. Nelson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Uncertainty, Risk,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pp. 361-392.
5. J. Lawrence Broz and Seth H. Werfel, "Exchange Rates and Industry Demands for Trade

Protection,” pp. 393-416.

6. Hun Joon Kim and J.C. Sharman, “Accounts and Accountability: Corruption, Human Rights, and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Norms,” pp. 417-448.

7. Charli Carpenter, Sirin Duygulu, Alexander H. Montgomery and Anna Rapp, “Explaining the Advocacy Agenda: Insights from the Human Security Network,” pp. 449-470.

8. Mark S. Copelovitch and Tonya L. Putnam, “Design in Context: Exist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New Cooperation,” pp. 471-49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8, No. 2

1. Rory Truex, “The Returns to Office in a ‘Rubber Stamp’ Parliament,” pp. 235-251.

2. Olena Hankivsky, “Rethinking Care Ethics: On the Promise and Potential of an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pp. 252-264.

3. Kenneth J. Meier and Amanda Rutherford, “Partisanship, Structure, and Representation: The Puzzle of African American Education Politics,” pp. 265-280.

4. Seok-Ju Cho, “Voting Equilibria Und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p. 281-296.

5. Christopher J. Fariss,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has Improved Over Time: Modeling the Changing Standard of Accountability,” pp. 297-318.

6. Timothy Besley and Marta Reynal-Querol, “The Legacy of Historical Conflict: Evidence from Africa,” pp. 319-336.

7. David Stasavage, “Was Weber Right? The Role of Urban Autonomy in Europe’s Rise,” pp. 337-354.

8. R. Daniel Kelemen and Terence K. Teo, “Law, Focal Points, and Fiscal Discip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p. 355-370.

9. Ryan Patrick Hanley, “The ‘Wisdom of the State’: Adam Smith on China and Tartary,” pp. 371-382.

10. Ben Ansel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wnership: Housing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State,” pp. 383-402.

11. Simon Chauchard, “Can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 Change Beliefs about a Stigmatized Group?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 pp. 403-422.

12. Xiaobo Lü, “Social Policy and Regime Legitimacy: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pp. 423-437.

13. Andrej Kokkonen and Anders Sundell, “Delivering Stability—Primogeniture and Autocratic Survival in European Monarchies 1000–1800,” pp. 438-453.

14. Tariq Thachil, "Elite Parties and Poor Voter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India," pp. 454-477.
15. Faisal Z. Ahmed, "The Perils of Unearned Foreign Income: Aid, Remittances, and Government Survival—CORRIGENDUM," pp.478-478.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1

1. Jan Aart Scholte, "Reinventing Global Democracy," pp. 3-28.
2. Bastiaan van Apeldoorn and Naná de Graaff, "Corporate Elite Networks and US post-Cold War Grand Strategy From Clinton to Obama," pp. 29-55.
3. Matthew Fluck, "The Best There is? Communication, Objectivity and the Future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56-79.
4. Leonardo Baccini, "Cheap Talk: Transaction Costs,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and Trade Agreements," pp. 80-117.
5. Jonas Tallberg and James McCall Smith, "Dispute Settlement in World Politics: States, Supranational Prosecutors, and Compliance," pp. 118-144.
6. Celina Del Felice, "Power in Discursive Practices: The Case of the STOP EPAs Campaign," pp. 145-167.
7. Lisa Strömbom, "Thick Recognition: Advancing Theory on Identity Change in Intractable Conflicts," pp. 168-191.
8. Markus Kornprobst, "From Political Judgements to Public Justifications (and Vice Versa): How Communities Generate Reasons Upon Which to Act," pp. 192-216.
9. Ian Hall, "The Satir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Disorders," pp. 217-236.
10. Jürgen Rüländ, "The Limits of Democratizing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ASEAN's Regional Corporatism and Normative Challenges," pp. 237-261.
11. Felix Berenskoetter, "Parameters of a National Biography," pp. 262-28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4

1. Jenna Jordan, "Attacking the Leader, Missing the Mark," pp. 7-38.
2. R. Scott Kemp, "The Nonproliferation Emperor Has No Clothes," pp. 39-78.
3. Gaurav Kampani, "New Delhi's Long Nuclear Journey," pp. 79-114.
4. 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pp. 115-149.
5. Kristin M. Bakke, "Help Wanted?," pp. 150-187.
6. Richard W. Maass, Carla Norrlof and Daniel W. Drezner, "Correspondence," pp. 188-20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1

1. Lauge N. Skovgaard Poulsen,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the Diffusion of Modern Investment Treaties," pp. 1-14.
2. Alexander Thompson and Daniel Verdier, "Multilateralism, Bilateralism, and Regime Design," pp.15-28.
3. Leonardo Baccini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Before Ratification: Understanding the Timing of International Treaty Effects on Domestic Policies," pp. 29-43.
4. Heather Elko McKibben and Shaina D. Western, "Levels of Linkage: Across-Agreement Versus Within-Agreement Explanations of Consensus Formation among States," pp. 44-54.
5. Bryan R. Early, "Exploring the Final Fronti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lobal Civil Space Proliferation," pp. 55-67.
6. Lori Poloni-Staudinger and Candice Ortals, "The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Transnational Activity: An Examination of Women's Groups in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and Germany," pp. 68-78.
7. Mark S. Manger and Kenneth C. Shadlen, "Political Trade Dependence and North-South Trade Agreements," pp. 79-91.
8. Wonjae Hwang and Hoon Leel, "Globalization, Factor Mobility, Partisanship, and Compensation Policies," pp. 92-105.
9. Raymond Hicks, Helen V. Milner and Dustin Tingley, "Trade Polic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arty Politic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FTA-DR," pp. 106-117.
10. Johann Park and Michael Colaresi, "Safe Across the Border: The Continued Significance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When Controlling for Stable Borders," pp. 118-125.
11. Douglas M. Gibler, "Contiguous States, Stable Borders, and the Peace between Democracies," pp. 126-129.
12. Erik Gartzke and Alex Weisiger, "Under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as Determinants of Systemic Liberal Peace," pp. 130-145.
13. Scott Wolford, "Power, Preferences, and Balancing: The Durability of Coalitions and the Expansion of Conflict," pp. 146-157.
14. Amitav Acharya, "Power Shift or Paradigm Shift? China's Rise and Asia's Emerging Security Order," pp. 158-173.
15. Oisín Tansey, "Evaluating the Legacies of State-Building: Success, Failure, and the Role of Responsibility," pp. 174-186.
16. Emizet F. Kisangani and Jeffrey Pickering, "Rebels, Rivals, and Postcolonial State-Building: Identifying Bellicist Influences on State Extractive Capability," pp. 187-198.

17.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Richard A.I. Johnson, "Politics and Parasites: The Contribution of Corruption to Human Misery," pp. 199-206.
18. Thomas G. Weiss and Rorden Wilkinson, "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ity, Authority, Power, Change," pp. 207-215.
19. Craig N. Murphy, "Global Governance over the Long Haul," pp. 216-218.
20. Mark Mazower, "Response," pp. 219-220.
21. Martha Finnemore, "Dynam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Building on What We Know," pp. 221-224.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8, No. 4

1. Manuel Schubert and Johann Graf Lambsdorff, "Negative Reciprocity in an Environment of Violent Conflict: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pp. 539-563.
2. Timothy M. Peterson, "Dyadic Trade, Exit Costs, and Conflict," pp. 564-591.
3. Nazli Avdan, "Controlling Access to Territ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and Visa Policies," pp. 592-624.
4. Simon Collard-Wexler, Costantino Pischedda, and Michael G. Smith, "Do Foreign Occupations Cause Suicide Attacks," pp. 625-657.
5. Sean Zeigler, Jan H. Pierskalla, and Sandeep Mazumder, "War and the Reelection Motive: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Term Limits," pp. 658-684.
6. Molly Inman, Roudabeh Kishi, Jonathan Wilkenfeld, Michele Gelfand, and Elizabeth Salmon, "Cultural Influences on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p. 685-712.
7. Alyssa K. Prorok and Benjamin J. Appel,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Democratic Third Parties and Civilian Targeting in Interstate War," pp.713-740.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No. 4

1. Rachel A. Epstein, "Assets or Liabilities? The Politics of Bank Ownership," pp. 765-789.
2. Michel Goyer and Rocio Valdivielso del Real, "Protection of Domestic Bank Ownership i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y of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in Takeovers," pp. 790-819.
3. Huw Macartney, "From Merlin to Oz: The Strange Case of Failed Lending Targets in the UK," pp. 820-846.
4. Rachel A. Epstein, "When do Foreign Banks 'Cut and Run'? Evidence from West European Bailouts and East European Markets," pp. 847-877.

5. Jana Grittersová, "Transfer of Reputation: Multinational Banks and Perceived Creditworthiness of Transition Countries," pp. 878-912.
6. Dorothee Bohle, "Post-Socialist Housing Meets Transnational Finance: Foreign Banks, Mortgage Lending,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Welfare in Hungary and Estonia," pp. 913-948.
7. Aneta B. Spendzharova, "Banking Union under Constructi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Ownership and Domestic Bank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European Union Member-States' Regulatory Preferences in Banking Supervision," pp. 949-979.
8. Shawn Donnelly, "Power Politics and the Undersupply of Financial Stability in Europe," pp. 980-1005.

Security Studies, Vol. 23, No. 2

1. Charles A. Kupchan,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Hegemony and The Coming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 pp. 219-257.
2. Jonathan N. Brown, "Immovable Positions: Public Acknowledgment and Bargaining in Military Basing Negotiations," pp. 258-292.
3. David C. Benson, "Why the Internet Is Not Increasing Terrorism," pp. 293-328.
4. Cullen S. Hendrix and Joseph K. Young, "State Capacity and Terrorism: A Two-Dimensional Approach," pp. 329-363.
5. Kristine Eck, "Coercion in Rebel Recruitment," pp. 364-398.
6. Jarrod Hayes and Patrick James, "Theory as Thought: Britain and German Unification," pp. 399-429.

World Politics, Vol. 66, No. 2

1. Timothy Frye, Ora John Reuter and David Szakonyi, "Political Machines at Work Voter Mobilization and Electoral Subversion in the Workplace," pp. 195-228.
2. Rafaela M. Dancygier, "Electoral Rules or Electoral Leverage? Explaining Muslim Representation in England," pp. 229-263.
3. Alex Street, "My Child Will Be a Citizen: Intergenerational Motives for Naturalization," pp. 264-292.
4. Ryan S. Jablonski, "How Aid Targets Votes: The Impact of Electoral Incentives on Foreign Aid Distribution" pp. 293-300.
5.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Domestic Institution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Charting the New Interdependence Approach," pp. 301-363.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3

1. William E. Scheuerman,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World State," pp. 419-441.
2. Martin J. Bayly, "The 'Re-turn' to Empire in IR: Colonial Knowledge Commun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 of the Afghan Polity, 1809-38," pp. 443-464.
3. Mark Langan, "A Moral Economy Approach to Africa-EU Ties: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pp. 465-485.
4. George E. Mitchell and Hans Peter Schmitz, "Principled Instrumentalism: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NGO Behaviour," pp. 487-504.
5. Caroline Fehl, "Unequal Pow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Case of Arms Control," pp. 505-531.
6. Simon Koschut, "Emotional (Security) Communities: the Significance of Emotion Norms in Inter-allied Conflict Management," pp. 533-558.
7. Ryan Griffiths, "Secession and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p. 559-581.
8. IL Hyun Cho and Seo-Hyun Papk, "Domestic Legitimacy Politics and Varietie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pp. 583-606.
9. Bruno Charbonneau, "The Imperial Legacy of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the Case of Francophone Africa," pp. 607-630

[整理: 李冰莹、赵姝婧、于凯玥]

[责任编辑: 于凯玥]

[校对编辑: 刘芮宁]

读编往来

【编者按】长期以来,《新视界》一直致力于成为国关学子同外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栏目发展至今,收到了许多来自老师和同学的祝福和建议,在这一期的读编往来中,小编也选取了几封来信,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的心得和对系刊的建议。

小编:本期的读编往来有幸邀请到吕海同学对系刊的各栏目做一个介绍,作为《新视界》的资深编辑,想必他对系刊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来信的最后也有对国关专业的学弟学妹们的鼓励和忠告,希望可以对大家未来的选择有所帮助。

吕海(2010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新视界》一直发挥着国关专业“第二课堂”的作用,在这里同学们可以学到很多在平常课堂中接触不到或者很少接触到的专业知识,例如学术论文可以提供最前沿的国际关系专业文章,国关人物可以向大家展示国关大师的生平与学术观点,知识角则能为读者打开一扇积累专业知识的小窗。

同时,《新视界》也是一个交流观点的平台。在这里要重点推荐的就是每一期的特辑:“新春特辑”能在新的一年给大家新的观点;“毕业特辑”则积淀了毕业生们在学习和生活经验与教训;“迎新特辑”为新同学展现了大学的各种可能性;“年中特辑”带大家回顾这一年的起起落落。每一期的特辑都能给同学们带来新的观点或者视角,可以为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诸多建议。此外,“读编往来”也是一个可以让大家自由发挥观点的园地,这里有大家对《新视界》最美好的愿景,也有大家对系刊最诚

挚的建议,各位的建议也是系刊前进的动力!

也许平日里,很多人吐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就业前景和发展方向。对于大家的困惑,我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我始终认为,一切以学科为借口的对就业前景的焦虑都站不住脚,一个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个人素养和能力。至于诸位今后是出国、保研、考研还是工作,希望各位能够好好挖掘自己内心的兴趣和潜能再做决定,而不是根据自己对这几条路并不完全明白的预期来决定自己日后的路。所有人都有其禀赋,希望诸位好好利用自己的才能!也希望《新视界》能帮助大家早日达成自己的目标!

小编:本期的读编往来中也有国关学子对系刊文章的评论和感悟,在拓展国关知识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并通过这个平台传递给大家。在这里,小编感谢几位同学的来信,也希望《新视界》可以带给读者朋友们更多的感悟和收获。

黄灏(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本期《新视界》继上期季乃礼老师的《威权主义心理视角下的中日关系分析》之后,国关人物部分对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兰德尔·施韦勒教授及其理论的介绍再次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其最著名的“利益平

衡理论”与最新的“全球失序理论”对我更好地理解新古典现实主义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也希望贵刊能够尽可能多的介绍一些国际关系流派及其相关知识,这对于我们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在更大程度上理解本专业是有很大帮助的。

杨致远(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本期《新视界》春季号中政府学院杨雷副教授所著的《乌克兰将走向何处》从俄罗斯的政策、美欧的立场和乌克兰新政权的政策选择三个方面,结合最近动荡不安的乌克兰局势对于这一地区的局势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解读,读来使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对此,本人希望从自己所学的国际法相关知识出发,结合近期克里米亚局势新动向对于俄罗斯影响下的乌克兰未来走向做一些补充。

背景方面,克里米亚局势动荡不安,严重威胁着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影响着乌俄关系的顺利发展,是困扰乌克兰的难题之一。2014年3月16日,乌克兰克里米亚共和国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继续留在乌克兰,还是加入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对欧安组织关于克里米亚公投违宪的声明感到失望,称克里米亚公投“完全合法”;与俄罗斯针锋相对的是,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不会承认乌克兰议会决定的所谓合法性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就其地位所举行的全民公投,同时主张准许国际观察员进入乌克兰,以免除莫斯科对俄语公民权利受尊重情况的担心。华盛顿方面希望通过准许国际观察员进入乌克兰以便对

俄语居民权利受尊重情况进行监督。乌克兰方面,法官委员会主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违法。

“只有一部在全乌克兰范围内举行全民公投的法律,所以对于单独地方来说,该法律不适用。”虽然俄罗斯、美国以及乌克兰前政府方面对于克里米亚公投保持分歧,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俄罗斯作为冷战时期苏联遗产与意志的主要继承者,对于乌克兰未来的走向始终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以下即为原因与国际法的解读。

历史方面,1954年,为了庆祝“兄弟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结盟300周年”,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把属于俄罗斯版图的克里米亚半岛作为“恒久友谊的象征”赠给乌克兰,决议的理由是“鉴于克里米亚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有共同性、地域接近、经济和文化关系密切”。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继续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引发许多民众不满。

事实上,由于克里米亚被赠送给乌克兰时并非无主地,所以只能适用国际法中对有主地的“时效取得”而非对无主地的“先占取得”。目前有据可查的有关“时效取得”的外交文件是美国国务卿奥尔尼1896年6月22日在致英国驻美大使的信件中明确提到了国际时效。规定将英属圭亚那一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争端提交仲裁的1897年《英美条约》,明确承认取得时效是国际法的一部分。该条约第4条中规定:“在50年期间的不当占有或时效应该产生所有权。仲裁员可

以将对一个地区的专属政治控制及实际定居视为足以构成不当占有或根据时效取得所有权。”这是唯一承认国际时效的国际条约。虽然克里米亚被赠送给乌克兰已经超过了 50 年，但是目前时效作为国家领土变更的方式在现代国际法上已没有意见，现代国际法承认的领土变更方式包括民族自决、全民投票公决、收复失地等三种。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何近日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突然“发威”，因为今年是克里米亚半岛被“赠送”给乌克兰 60 周年。2004 年俄罗斯没有“发威”是因为那时它还没有实力去叫板整个欧洲，现在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且不说国际法中的 50 年国际时效并没得到普遍承认，就算有这个时效，就算超过了 70 年、80 年，俄罗斯也可以不承认，何况当地的主要是俄罗斯族人，无论通过民族自决还是全民公决，俄罗斯都稳操胜券。实在不行，俄罗斯还有最后一张王牌：武力。有些人以为俄罗斯会屈服于国际压力不敢动武，他们忘了，俄罗斯不是伊拉克、不是北朝鲜。它是一个在近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巨人，是让全

世界害怕的“北极熊”，苏沃洛夫时代远征南欧让全欧洲看到了俄国军人“刺刀穿透阿尔卑斯山”的英雄气概，库图佐夫时代击败拿破仑、再加上镇压波兰和匈牙利起义，俄国当时被称为“欧洲宪兵”，不但可以不遵守所谓的国际法，它其实就是国际法的制定者。因此，目前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局势咄咄逼人的态势直接导致乌克兰未来的走向变得混沌不清。

李嘉东(2012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新视界》是我所学专业的系刊，通过阅读本刊物，我不仅能够及时了解最近时事政治，对国际政治动向保持一定的敏感性，而且可以领略本专业教师与其他相关专家对于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深入解读，可谓是我的良师益友。本期《新视界》中，我特别阅读了杨雷副教授所著的《乌克兰将走向何处》一文，使得我对于近期克里米亚公投以及其后继发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希望贵刊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刊发相关主题的高水平文章。

[整理：杨至远、李冰莹、王迪雅]

[责任编辑：李冰莹]

[校对编辑：杨 雪]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01 页。

2. 编著: 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0-68 页。

3. 译著: 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 在文献名之后, 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 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 如为三人以上, 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盛洪、张宇燕:《旧邦新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9 页。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著者, 文章题目(加书名号), 文集编者名称,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 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9-117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15-17日,第3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三) 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 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

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 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4 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 10000 字以内为宜。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并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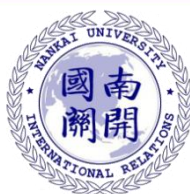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